

红旗

HONGQI

13-14⁰

一九六三年



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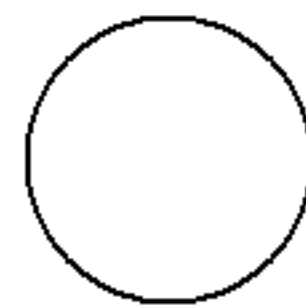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

目 录

社 论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 (2)
	一个团结勤奋向上的集体.....李成章 华 福 (15)
	老贫农的本色李廷凡 钱 进 (19)
	“劳动带头干, 工作是模范”.....申元则 连治水 (23)
	身份是社员, 劳动是本分孙汝纯 毕可友 (27)
	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郑际雄 (30)
	社员的好榜样, 青年的带路人.....莫占林 (35)



他們为什么能一贯参加劳动?万里云 潘用庭 (39)

四望山下 碧 野 (42)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王樂生 杜加星 項紹棠 (47)

他是庄稼人周維敷 任洁民 (52)

十三年手不离鋤張 健 任 山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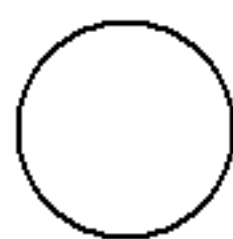
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
 伟大范例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 (60)

把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永远坚持下去
 中共鞍山市委委员会 (66)

地委书记余锡渠同志伊 曉 (71)

☆ 七月十日出版 ☆





——社 論——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 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

列宁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榜样底意义，比如說，某个生产組合榜样底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满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才能够梦想以慈善机关榜样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轉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在剝夺者已被剝夺以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榜样底力量——如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所多次指示过的那样，——第一次有可能来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①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不断反复地证明了列宁这个論点的千真万确。

本刊十三、十四期合刊发表的十四篇文章，介绍了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县、专区等几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些模范事迹。这些集体的和个人的光辉榜样，有力地激励、推动广大干部，包括在集体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工作的干部，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制度，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些光辉榜样，同时又启发我們进一步認識、領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深刻意义。

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本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告訴我們：

一、干部和群众一起劳动，以实际行动表明我們的干部同样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群众就会把干部看作是他們自己的“贴心人”，对干部无話不說，无事不談，彼此之間亲密无間。

有的人民公社干部說：“社員看干部，亲不亲，看劳动。”“咱是劳动人民出身，劳动是咱的本分，不劳动就要脱离群众。”

社員群众反映：“社、队干部和咱們一起劳动，咱們和干部就沒有隔膜。”

二、干部坚持参加劳动，能够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发揚艰苦朴素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有的基层干部說：“铁耙不用要生鏽，干部不参加劳动会褪色。”“劳动是对咱們的考驗。”

^① 《苏維埃政权底当前任务》。《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91頁。



“干部和社員一起劳动，臉上的灰尘，身上的髒东西，大伙看得一清二楚，馬上帮着擦洗，使干部永远干淨。”

三、农村工作干部参加劳动，可以增强阶级意識和阶级感情，更好地依靠貧农、下中农，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綫。

有的人民公社干部說：“劳动把阶级兄弟的心联結在一起”，“革命干部不劳动，就会忘記过去的穷兄弟，就会在阶级斗争中站不稳脚跟。”

四、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加劳动，能够有力地激发群众的劳动热情，鼓舞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群众說：“干部积极带头劳动，咱們都把心窝子掏出来干。”“干部下田間，一天頂两天，問題解决快，社員干得欢。”

五、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可以增加社会物质財富，減輕生产者的負担，巩固集体經济，巩固全民經济，促进生产发展。干部在生产中洒下了自己的汗水，就更加爱惜劳动的成果，成为社会主义經济的精打細算的好管家人。

六、干部参加劳动，起着移風易俗的作用，有利于造成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社会風气。在这种社会風气下，能劳动的人不劳动，就会觉得“理亏”，就会觉得难为情。

七、在干部参加劳动的影响下，年輕的一代，就可以循着勤劳、儉朴、热爱集体的道路，健康地成长起来。

群众說：“守着什么人，学出什么人，什么样的人，教出什么样的人。”

八、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生产情况更熟悉了，生产知識更丰富了。不懂生产技术的干部，拜老农为师，或者拜老工人为师，学会了生产技术，取得了生产經驗，领导生产就更具体、更踏实了。

有的基层干部說：“只有参加生产，才能取得指揮生产的发言权。”

九、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便于在生产中进行科学試驗，經過刻苦钻研，可以把自己鍛炼成又紅又专的干部。

有的干部說：“生产劳动像熔炉，既能把思想炼紅，又能把本領炼好。”

十、干部在劳动中和群众打成一片，能够及时地宣傳、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針政策，很好地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实际情况，有利于进一步地发展民主生活，正确地解决工作中的問題。

有的干部說：“和群众同劳动，同商量，既能摸透人的脾气，又能摸透自然的脾气，这是领导好生产的两个重要条件。”基层干部“經常和群众滚在一块，貼着身子实干，实际情况了解得透，底子摸得清，說的話，句句在群众心上，出的点子，个个合群众心意。”

群众反映：“干部参加了劳动，能看到，能听到，能作到，能說到，生产还能搞不好！”



总之，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制度，参加集体经济或者全民经济的集体生产劳动，这表示我们党的干部同样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爬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就能够同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及时地了解阶级的关系、群众的问题和生产的状况，及时地同群众商榷，更好地发扬民主，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

相反，我们的干部，如果不积极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群众就会把这样的干部看作“官老爷”，这些干部就要脱离广大群众，就会在思想感情上和劳动人民疏远起来，群众就不会对他们说知心话。他们就不能深入地了解情况，如实地反映情况。正如有的基层干部说：“要是脱离了劳动，只能摸到问题的毛毛皮皮。”“不参加劳动，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浮在上面，摸不到底。”这样，干部就听不到群众的呼声，了解不到群众的要求，出的主意就不能符合实际情况，就不能执行群众路线，难以健全民主生活，无法正确地解决问题，真正做好工作。有的干部如果长期脱离劳动，就会从轻视劳动，不劳动，发展到厌恶劳动，贪安逸图享受，从铺张浪费到挪用公款，甚至发展到贪污盗窃，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

由此可见，广大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一个普通劳动者，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虽然干部和群众之间有分工上的不同，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在旧社会，在剥削制度下，各级官吏是爬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欺压人民、剥削人民，他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对立的关系，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我们新社会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同旧社会的官民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当了干部就以为是做了“官”，染上“官老爷”习气，这就混淆了新社会干群关系同旧社会官民关系的界限。

人民群众对于干部染上官老爷习气是很不满意的。如果干部不按照规定的制度参加劳动，自视特殊，以为比群众高出一头，群众就会把他们看作是“官”。山东省文登县高村人民公社社长兼生产大队队长张富贵同志的体会，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有一段时间，张富贵同志参加劳动少了，有些社员就说他“当上了甩手掌柜”，看到他过来就说“大官来了”。他由此提高了警惕，自觉地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就逐步改变了群众对他的看法，重新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信任。北京市顺义县张喜庄人民公社后渠河大队第二生产队队长，由于不参加劳动而落选的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



生产队队长“光说不练”，“只谋不干”。他在社员干活的时候，总是两手背在后面，哈着腰问社员：“你干得怎么样啦？”或者对社员说：“你干得对！对！对！”说完就照例倒背着双手，到生产队的场院看门睡觉去了。社员们一看到这位队长，都装作没有见到他一样。今年改选队干部的时候，社员群众就不选他做队长了。前一个事例说明，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勤勤恳恳地当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后一个事例说明，基层干部脱离劳动，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

一个革命干部，要能够真正做到自觉地参加劳动，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深厚感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干部在劳动中和群众同甘共苦，又可以进一步地提高阶级觉悟，更好地培养阶级感情。农村和城市的事例，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事例，都证明，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干部，当了干部仍然坚持参加劳动，能够使自己固有的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始终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干部，在生产劳动中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可以改造自己，真正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成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立场的革命干部。这样，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更好地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同群众一起，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表明干部以身作则，向好逸恶劳的恶习，向企图靠剥削别人发财致富的人，向一切轻视劳动人民的旧观念、旧思想、旧习惯，进行坚决的斗争。山西省昔阳县，浙江省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在广大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浪潮中，形成了一种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全新的社会风尚。它使好逸恶劳的人受到责备，不能心安理得；使游手好闲的人受到群众监督，不能洋洋得意。这种社会风尚，在那些地方已经成为一种滌荡和扫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成为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在这里，还需要说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干部是数以千万计的，他们的子女的人数就更多了，我们的干部尽可能地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可以给予子女后代做出良好的榜样，使子女后代从小就养成爱好劳动的习惯，尊重劳动的感情。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将来，毫无疑问，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

好逸恶劳是剥削制度造成的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惯势力，是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一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我们在向这种习惯势力和传染病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大大提高劳动人民的自觉性，激发劳动人民的热情，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劳动。正如列宁所说的：“要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要使地主资本家的政权永远不能复辟，就必须建立一支伟大的劳动红军。这支劳动红军只要有了劳动纪律，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工人和农民应当证明，而且他们一定会证明：他们在不要地主并反对地主，不要资本家并反对资本家的情况下，自



己会正确分配劳动，树立起为共同利益而劳动的严密的纪律和忠诚老实的态度。”又说：“劳动纪律，高涨的劳动热情，自我牺牲的决心，紧密的工农联盟，这就是使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的东西。”①

同时，我们又必须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对过去的剥削者、寄生虫进行严格的监督，强迫他们实行劳动改造。也正如列宁所说的：“只有由工农群众自愿而诚意地带着满腔革命热情来共同进行这种对富人，对骗子，对懒汉，对流氓而实行的统计和监督，才能克服可恶资本主义社会底这些余孽，才能克服人类中的这些糟粕，这些无可救药的，腐败的，僵死了的成份，这种由资本主义留给社会主义的恶疾、瘟疫和毒瘤。”②

好逸恶劳还是诚实劳动，轻视劳动还是热爱劳动，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干部认识不够，觉悟很低，不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制度积极参加劳动，不在群众中做出诚实劳动、热爱劳动的榜样，我们就不能有效地提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不能很好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对一切剥削者和寄生者，实行严格的劳动监督。时间长了，反动的剥削阶级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就会利用某些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空子，使用各种手段，对干部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把某些蜕化变质的干部变成他们的代理人，或者在一些组织中安置他们的人，从而达到他们篡夺我们某些单位领导权的目的，使个别单位的党的组织、政权组织、经济组织或者群众组织的性质发生变化。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不坚定分子，也会在敌人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下，受骗上当，以至于和他们同流合污。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就可能出现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极为不利的严重局面，就可能出现反革命复辟的严重危险。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并且指出，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尽管这种斗争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但是，无产阶级终究会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终究会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我们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整个中国必将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

我们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的根本保证，是我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党的领导下，早已建立了

① 《留声机片录音演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20页。

② 《怎样组织比赛？》。《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309页。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我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革命专政。在我国国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只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寄生虫、骗子、流氓，他们在全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而拥护这个革命专政的却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他们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革命的知識分子、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侨胞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充分的信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一方面，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那些图谋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创造条件。

领导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是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是一个善于把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是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是一个善于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革命党，是一个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久经考验、久经锻炼的，光荣、伟大、正确的革命党。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已经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并且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伟大红旗的指引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胜利。在这个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正在把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党，为了履行中国工人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赋予它的神圣职责，过去已经坚决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斗争，现在和将来也还要继续坚决向它们进行斗争，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捍卫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维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维护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利益。

为了继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全国人民面前，在全党同志面前，有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我们必须向那些企图削弱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削弱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倾向，哪怕是一种处在萌芽状态的



倾向，进行严肃的斗争；向那些如果滋长起来就有可能影响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改变性质，影响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党改变性质的倾向，在这些倾向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进行严肃的斗争。我们必须倾听群众的呼声，总结实践的经验，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训，采取有效的制度，来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性质，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性质。在这方面，全面地、系统地、持久地实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党组织，有密切联系劳动群众的义务，没有脱离劳动群众的权利。我们国家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放在积极劳动的先进分子手里。基层政权的干部，基层党组织的支部书记，不但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而且必须在劳动中是最积极的分子。他们应当力争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只要我们的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制度，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的集体生产劳动，我们的干部就一定能够同劳动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政府和各级党组织，就一定能够同劳动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摧毁以至肃清那些妄图侵蚀、以至瓦解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各种反动势力，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断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要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继续处理敌我矛盾的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①

生产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不同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的问题。在我国，废除了剥削制度以后，早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全国人民已经结成同志式的合作互助的关系，从事生产斗争。这种生产斗争愈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愈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的积累就愈增加，我国人民的生活就愈富裕。所以，对于我国劳动人民来说，进行生产斗争已经不像在旧社会那样，只是他们免于饥饿、免于死亡的谋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生手段，而已經成为創造幸福新生活、建設偉大新社会的根本途徑。我們必須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組織一切可以組織的人員，全部投到生产斗争中去。决不能使那些能够参加生产斗争的人不参加生产斗争，决不能使那些不需要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任意地脱离生产劳动。

馬克思說过：“节省時間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門中有計劃地分配劳动時間，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經濟規律。”^① 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还說过，在各个生产部門之間分配劳动時間，或者說分配劳动力以外，还有一个在整个社会中的生产部門和非生产部門之間分配劳动力的問題。馬克思說：“……生产劳动者会替不生产劳动者，創造他們所賴以維持，所賴以生存的物质基础。”^② 又說：“假設两国的人口相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又相等，則亚当斯密如下的話，常常是正确的：两国的财富要由生产劳动者与不生产劳动者間的比例来丈量。这不外說，在生产劳动者人数比較多的国度，年所得中将有一个比較更大的量，被消費在再生产上，所以每年会有一个較大的价值量被生产出来。”^③ 对于这个重要問題，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曾經作了通俗而深刻的說明。他說：“我們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們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險。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④ 毛澤东同志还說过，即使那些必須脱离生产事务的人員，也要尽可能地参加生产，来增加物质财富，以減輕生产劳动者的負担。他說：“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訓練和工作的間隙里，一律参加生产。”^⑤ 他又說：“現在我們边区的軍队已經学会了生产；前方的軍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們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說过的：‘无敌于天下’。我們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占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絕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給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給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生产日用品。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問題，用稅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給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結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軍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⑥

毛澤东同志的这些話，一直到今天还保持着非常现实的意义。毛澤东同志說这些話的时候，我們党还没有在全国範圍內掌握政权。解放以后，我們党已經处于全国执政党的地位。

① 《1857—1858年經濟学手稿》。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頁。

②③ 《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86、373頁。

④ 《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解放社1944年版，第177頁。

⑤ 《必須学会做經濟工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17頁。

⑥ 《組織起来》。《毛澤东选集》第3卷，第932—933頁。



这种地位就要求我們更加警惕地、更加认真地注意在生产部門和非生产部門分配劳动力的問題，更加用心地、更加有效地增加生产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生产人員。城市要十分注意这个問題，农村同样要十分注意这个問題。

我們手边有一个生产大队的材料。这个生产大队共有一百九十八戶，八百三十五人，男劳动力一百四十五名。由于五个大队干部違背国家規定的制度，完全不参加生产，或者几乎不参加生产，由于每个生产队享受工分補貼的人員过多，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的时间沒有达到規定的标准，所以，全大队的干部，包括生产队干部，他們在一九六二年的全年工分補貼，竟达到了該大队全年总工分的百分之十点二，等于制度規定的百分之二的五倍以上。全大队的干部包括生产队的干部，全年工分補貼总数，相当于該大队二十七名中等劳动力全年劳动所得的工分。这样做的結果，增加了社員的負担，减少了社員的个人收入，减少了集体經濟的积累，挫伤了社員群众的集体生产积极性，使干部严重地脫离了群众。当然，这样的例子是极个别的。我們全国絕大多数的公社、絕大多数的生产大队、絕大多数的生产队，是同这个大队不一样的。但是，我們应当从这种个别的例子中，看出一个基层干部任意脫离生产劳动的重要問題，看出一种可能发生的、因为干部不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严重脫离群众的傾向，并且决定我們对这种問題、这种傾向的态度。

究竟我們对这种傾向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容忍这种傾向，放纵这种傾向，甚至还找出这样那样的理由，例如說什么干部工作忙，不参加劳动是可以原諒的，說什么干部参加劳动就沒有时间做好工作，还說什么干部参加劳动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这样来助长这种傾向呢？还是应当严肃对待，认真处理，批評这种傾向，制止这种傾向，駁掉各种各样为这种傾向辯护的所謂理由，坚持党和国家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呢？我們认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采取的态度，只能是后者，絕不能是前者。原因很简单，虽然像前面所說的那个大队的例子在我国社会里是极个别的，我們的绝大多数干部是遵守制度，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但是，这个例子，确实代表一种如果我們不加警惕就会滋长起来的傾向，确实說明好逸恶劳的恶习已經侵蝕了我們一些干部。如果我們不采取严肃的态度去制止它，而采取錯誤的态度去放纵它，这种傾向就会发展起来，好逸恶劳的恶习就会侵蝕我們更多的干部，違背党和国家規定的制度而脫离集体生产劳动的人就会一天天多起来，不生产物质財富而消耗物质財富的人就会一天天多起来。这样，脫离实际、脫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就会滋长蔓延，生产劳动者的負担就会愈来愈重，生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挫折。对于一种坏的傾向，我們应当在它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看見它，制止它；不要等到它发展起来，才去注意它。到那个时候，我們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即使能够克服它，也要花很大的力气了。

不应当脫离生产劳动的人，任意地脫离生产劳动，能够而且必須参加生产劳动的人，不



尽可能多地参加生产劳动，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能否迅速增加的重大问题。

大家知道，我国社会主义资金的积累，正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绝不能用帝国主义者掠夺殖民地的办法来实现，绝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索取赔款的办法来实现，也不能靠从外国取得奴役性借款的办法来实现。帝国主义者不会借款给我们，帝国主义的走狗外国反动派也不会借款给我们。我们也根本不打算接受任何不平等的条件，向帝国主义者、外国反动派或者其他什么人借款。

我们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要同世界各国进行国际贸易，互通有无。要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主要的是依靠自力更生。我国社会主义资金的积累，唯一的来源是靠自己，靠全国人民辛勤劳动，增加生产，靠我们坚持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

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六亿多英勇勤劳的人民，有成百万成千万品质好、作风好、联系群众、受到群众欢迎的干部，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不可比拟的广大的国内市场，有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这些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完全有可能，因而也完全有信心，通过内部积累的途径，增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说，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没有任何困难呢？能不能因此就说，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呢？不能这样说。除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捣乱以外，这里要着重说到的是：在我们的干部中，还有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这些同志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进攻，熟视无睹，麻痹大意，甚至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些同志的官僚主义还表现在：有的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有的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检查工作。有的不钻具体业务，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思想政治工作。有的爱铺排，摆摊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人力、物力、财力浪费很大。有的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遇事推诿，不负责任，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好逸恶劳，多吃多占，争名位，摆官架子，官气很大，不关心群众痛痒，不关心国家利益。有的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压制批评，滥用权力，违法乱纪，甚至站在群众头上，称王称霸。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存在以至滋长，必然妨碍领导和群众的团结，妨碍人民内部的团结；必然伤害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积极性，伤害劳动人民进行生产斗争的积极性；必然使我国深厚的生产潜力不能充分地发掘出来，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事业不能顺利地向前发展；必然使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成果不能合理地利用，甚至会造成不应有的严重损失。这样，就不但不能增加、反而会浪费社会主义积累的资金，不但不能加快、反而会减



低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速度。

官僚主义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遗留给我们的毒害。而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使我们能够最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必须无情地揭露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深刻地认识官僚主义在各方面对我们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提高干部的觉悟，动员广大的群众，严肃地、认真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是沒有染上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都应当随时警惕，避免这种毒害的影响。凡是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染上了官僚主义习气的干部，都应当痛下决心，从自己身上把这种习气扫除干净。我们务必力求作到，在革命队伍里面，在各级政府里面，在各种事业、企业单位里面，在人民团体里面，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斗争，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只要我们认真地、逐步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强领导和群众的团结，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大大地激发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积极性，进行生产斗争的积极性，充分发掘一切生产潜力，顺利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事业。这样，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大大增加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数量，大大加快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速度。我们每年资金的积累，就将比现在多得多、快得多。让我们的全体干部都深刻地认识到，用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来增加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吧！

官僚主义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要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我们各方面进行认真的工作。要加强政治上的领导，要进行组织上的合理调整，要抓紧思想上的说服教育，要废除那些使官僚主义能够存在和滋长的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坚持和建立那些能够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这方面，我们要坚持的重要制度之一，就是党和国家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说：各级干部凡是能够而且需要参加体力劳动的，每年都要抽出一定时间，采取各种各样办法，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解决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一九五八年九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几年来，我们许多干部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和决定，在进一步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必须继续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和决定，并且总结实践的經驗，使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更加完善起来。

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干部是在战争中学会领导战争、指挥战争的。如果当时我们的干部不投身到战争中间去，只是纸上谈兵，那就不可能学会领导战争、指挥战争，我国



人民也就根本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同时进行生产斗争，已经成了全国人民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广大干部也必须投入到生产斗争中去，在生产中学会领导生产、指挥生产，了解生产斗争的规律，掌握生产斗争的规律，把全国人民更好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生产斗争的伟大革命运动，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要使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要使我们的伟大祖国在世界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在全国持久地开展三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一个是阶级斗争的革命运动，一个是生产斗争的革命运动，再一个是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技术水平还很低，我们要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在科学技术上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在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革命运动的同时，发挥现有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开展一个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

这样三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意义极其深远，规模极其宏大，内容极其丰富，问题非常复杂。采取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方法是绝不可能领导这样的革命运动的，只有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格的科学态度，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谨的科学方法，才能领导好这样的革命运动。

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运用严谨的科学方法，进行工作，首先就要系统地、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准确地、全面地了解实际情况，以便得到正确反映实际的思想，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使主观指导符合于客观实际。调查研究，不是走马观花，不是东张西望，不是道听途说，不是搜集一些表面的片面的个别材料，为自己的主观主义设想辩护，而是真正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蹲下来，与群众同劳动，同商量，对一些重要问题，取得系统的、最基础的知識。但是，有一些同志则不是这样，他们口里也讲调查研究，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因而他们就不会做、也不会做好什么调查研究工作。在调查研究中，把群众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还要经过思考，经过分析和综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和意见，加以鉴别，特别是要进行阶级分析，弄清它是从哪个阶级来的，对哪个阶级有利，这样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取舍。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听到、看到的一切，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接受过来，那是很危险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最好的调查研究的方法之一，因为在生产劳动中，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乐于对干部说知心话，干部能够真正了解群众的情绪、要求和愿望，才能如实地反映情况，细致地分析问题。如果干部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群众，下去调查，只是主观



主义地大胆假设；然后又主观主义地小心求证，这样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好调查研究工作的。

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把经过调查研究，经过典型试验，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还要到群众的实践中去进行检验。经过多次反复，使领导的意见逐步地完善起来，并且变成群众的行动。这又是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方法进行工作的一项决不可少的要求。采用这样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工作，我们的工作就能进行得更顺利，更有把握，避免或减少某些错误。

上面所说的这种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認識論。学会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进行工作，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認識論，是摆在我们广大干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認識論，他們的世界观和方法論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們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們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我们领导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取得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胜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制度。我们要使这种制度更好地坚持下去，就必须进行思想斗争，克服思想障碍，切实帮助干部深刻認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同时也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特别要加强对县委的领导、帮助和监督，认真提高县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督促他们以身作则，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劳动。要帮助县级党、政组织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精简会议，简化公文表报，为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创造有利的条件。并且经常认真地检查、了解基层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在广大的基层干部中，在广大群众中，造成参加劳动光荣、不参加劳动可耻的革命风气和革命舆论。

我们全体干部必须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人民群众一起，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只要我们认真地这样做，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能够在国际国内的任何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永不褪色；我们的党就能够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我们的国家就能够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够更加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就能够更快的发展；我们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帮助就会更多，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完成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赋予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一个团结勤奋向上的集体

李成章 华 福

一九六三年四月下旬，云南省晋宁县上蒜公社上蒜大队三十个生产队的队长开评比会，一致评选上蒜村第四生产队为模范生产队。生产队队长们说：上蒜四队的干部和社员一条心，觉悟高，集体生产搞得好，国家的任务也完成得不错，确是一个模范队。我们要向四队看齐！

有个好队长

上蒜村四队为什么能成为模范生产队呢？

这个队的社员说：“龙头动得好，龙身才舞得好；因为我们有个好队长呀！”就在评选模范生产队的当天晚上，社员们不顾队长李凤英的反对，首先提名“李大姐”，要评选她为模范社员。

上蒜村本来是一个生产队。因为户数太多，安排生产不方便，去年夏天划分成四个生产队。分队的时候，社员们都盘算该选谁当队长。四队的社员在心里点了点本队的人，认定原来的副队长李凤英适合，便议论着要选她。李凤英听说要选自己当队长，愁得不得了。她想：过去虽然当了几年副队长，但究竟是副的，天塌下来，有长汉子顶着。现在要自己做长汉子，大字不识一个，记性又不

好，那行吗！正在这时候，从前的社长、现在的县委书记李能同志回村子来了。李能很了解李凤英。听说这事，他便去找李凤英。李能说：“大家要你当队长，你不当，是吧？”“是的呀，大哥！”李凤英老实地承认。李能对她说：“当队长当然不会没有困难，不过只要依靠党支部的领导，有事找社员群众商量，按党的政策办事，大公无私，工作是可以搞得好的。”李凤英不吭气。“你不想当，好吧！”李能说，“那就让地主、富农来当吧！”

响鼓何消重槌！李能这一句话，打动了从小受苦受难的李凤英的心。从此，李凤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拿出全部力量，挑起九十多口人的生产、生活的重担。她牢牢记住党的教导，认真地贯彻党的政策，把集体经济办好。

最令社员钦佩的，是李凤英的大公无私。去年，公社号召社员积极支援国家建设。李凤英家里养了两头猪，火把节杀了一头，把一半卖给国家。后来她想，卖活猪给国家，国家才好调运，便说服她哥哥李进，合伙又把一头大猪卖给供销社。去冬订积肥计划分配任务时，有个队委委员建议：“大姐事情忙，要照顾全盘，还要开会，莫要给她订任务了，我们一个多簸几簸就行了。”社员都赞



成。可是李凤英却反对。她說：“这些事情，我們当干部的更要带头。”去年她家的投肥任务是五千斤，結果投出了五千一百五十五斤。今年已經投出的肥料，按劳动力計算，也比大部分人家多。不久前，队上計劃在种植业方面开展多种經營，要撒辣子秧，但是沒有种子。李凤英說：“我家有，先拿去撒了再說。”李凤英不但生产安排得好，对社員生活也很关心。所以社員們越来越热爱、信任自己的队长。社員二順的媽甚至这样說：“我們的队长，点着火把都沒处找。”

团結的队委会

社員們把当上模范生产队的功劳归在生产队长身上，队长坚决不同意。李凤英說：“我，有个哪样本事！一个巴掌拍不响。我們队的事搞得还可以，是因为干部、社員团結心齐。”

事实确是如此。这个生产队团結的核心，是由老貧农和下中农組成的队委会。李凤英在工作中，紧紧依靠了这个队委会。七个队委委員中，有三名共产党员；其中，五人是貧农，两人是下中农。他們当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因为公道和能干，得到社員的信任。这是他們共同的地方。

此外，他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副队长段云，他最大的优点是不会光扛着鋤头轉田。他既督促社員做，又自己亲身做。累人的活計他搶着做。再說当了近十年保管員的李昌，得了个“铁柜子”的美名。他把保管工作的范围，从仓库扩大到了田里。段寿是个青年人，不爱說話，主意少些，但會計工作做得挺認真。初当四队會計的时候，沒

有經驗，很少公布工分。社員提了意見，他馬上改进，做到工分十天累計一次，十天公布一次，一直坚持到現在。

队委委員們在工作中既有明确的分工，同时，也能很好地合作。李凤英管全面，李昌、段寿管财务，馮会仙帶領妇女做活，段云、段有志等帶領男社員做活。有事情，总是大家先商量，思想一致了再干。李凤英常說：“一人沒有二人意，三人出个好主意。”大大小小的事，她都尊重队委会成員的意見。队委委員們受到尊重，就更爱出主意、提意見。队长和队委委員团結、齐心。这种团結齐心，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灶头会”上。

什么叫“灶头会”呢？“灶头会”是一种每天晚上都开的碰头会，会场就在队长家的厨房的灶面前。队委委員們常在晚上找到李凤英家的灶房里来商量工作。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每天晚上天一黑，不用請，不用喊，村这头、村那头的大部分队委委員，就信步走到李家灶房里来。有工作就商量工作，沒工作就閑聊一陣回家。事实上，“灶头会”成了队委会議的补充。

“灶头会”的内容，一般是研究当天的生产情况，安排第二天的生产，研究社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灶头会”上的亲切交談，还往往貫穿着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有天晚上，商量开展多种經營，預备利用村旁的两个塘子栽茭瓜。有个队委委員說：“栽茭瓜，我們赶紧点，免得其他三个队也来爭塘子。”李凤英想，这两个塘子，是四个队共有的，而且李能同志回家来也經常說，四个队要团結好，共同搞好生产。她便对那个队委委員說：“你想把我們生产队搞好是对的，但那三个队将来



收入少，还是要不得。要四个队都增产增收才好。”过后，他们就去找另外三个队的队长，讲了栽茭瓜的打算，一齐到塘子边商量着划了水面。又有一天晚上，一个队委委员告诉李凤英，說她的儿子李来学，挖田的质量不好。李凤英不仅批評了儿子，并且还在社員大会上檢討了对儿子管教不严，建議减发工分。

干部带头劳动

第四生产队的干部，都是生产上的能手，都能在劳动中起带头作用。队长李凤英对栽秧、打豆最内行，副队长段云是使牛的好手，其余的队委委员在劳动上也从不让人。小春作物成熟的时候，队上派人去看守，免得猪、鸡到田里糟蹋。换了几个人都看不好，队委会决定派队委委员李昌去。李昌不怎么願意。他說：“这些輕巧事，找年紀大些的人做吧，我才五十一岁，該和大家一道挖田。”后来大家把他說服了。不过他和別队看豆的人不同。別人空着手看守，他却扛了鋤头去就近挖田。翻田正緊張的时候，許多人家的小猪滿了双月，該卖了。有的社員請假去赶街。段云虽然也需要卖猪，却没有請假。有人劝他去，他摇摇头說：“这几天活計正紧，大家正看着我們呢！”始終和大家一道挖田。栽秧正紧，李凤英病了。有人劝她休息，她說：“农忙时候，一个人要頂几个人用，怎么能閑着！”她就去替社員煮飯，換出一个劳动力栽秧。

队干部們不仅成天忙在田里，还专拣难干的活几干，哪里困难大就到哪里去。春天，队上挑塘泥改造白胶泥田。干这项活是挺累人的。男队委委员大都参加了进去。开始，有的社員把塘子泥挑到田边上就倒。李昌

等队委委员总是挑到大田当中去倒，社員在他們的影响下，也都跟着把塘泥挑到田中間去了。队上栽茭瓜，要用些刺棵拦猪，派妇女去砍。有些女社員怕刺戳，犹豫着。李凤英和队委委员馮会仙二话沒讲，拿起镰刀就干。女社員們看了，佩服地說：“我們是娘养的，人家也不是蛋抱的。她們不怕，我們怕哪样。上！”就都上去了。

队干部們这样热心参加劳动，是有原因的。党經常不断地教育李凤英，当干部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与社員同甘共苦。李凤英把这話牢牢記在心上，用来鞭策自己，也督促队里的干部。他們现在的共同体会是：当干部的跟社員同甘共苦，社員才会跟你一条心；劳动果实要用汗水去換。因此，尽管他們常要花一些時間操心队上的事，可从来不随便耽誤参加集体劳动。为了坚持劳动，他們还在干部报酬方面采取了措施，队长和副队长一律是誤工補貼，不領固定補貼，會計每月領一点固定補貼。

四队的干部平时很注意勤儉節約。为了办好集体經濟，处处精打細算，做到省得一顆是一顆，省得一分是一分，因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社員收入。

队干部在与社員共同劳动中与社員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社員把干部当作自家人，从搞好生产出发，有意見就提；干部对社員的意見能虛心听取，認真对待。

思想工作第一

为了保证把人民公社集体經濟办好，第四生产队的党小組和队委会，始終注意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們进行思想



工作的特点是：經常結合工作，抓住活的思想，因人制宜地进行思想教育。

他們平时注意对社員进行階級斗争的教育，不断提高社員的思想觉悟。四队的社員大部分是有比較明确的階級观点的，但也有少部分社員，尤其是青年社員，对階級斗争缺乏認識。队里的富农李左香，伪装积极，暗地里却进行破坏。有些人看不清楚，认为現在地主、富农改造得差不多了，都是挣工分吃飯。党小組和队委会很重視这个情况。李凤英經請示大队党支部，召开了社員大会，充分发动群众，揭露了富农的破坏活动，使社員受到了深刻的階級教育。段云曾感慨地說：“地主、富农就是不会甘心他們的失敗的，他們見不得我們好，总是要进行破坏的！我們随时都要提高警惕。”

上蒜村的农民，解放前受着地主、富农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貸剝削，受着反动政府和軍隊殘酷的压迫。提起过去，人們就会眼泪汪汪。解放以后，經過土地改革，党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在这里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人們的生活蒸蒸日上。現在，村里有了卫生院，人們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衣食更是有了保障。因此，四队的党小組和队委会在进行思想工作的時候，牢牢抓住了回忆对比的方法。例如，副队长段云的媽嫌儿子整天为队上的事情忙，沒時間种自留地，常埋怨段云。段云很煩惱。李凤英知道了，一面鼓励段云，一面去說服段云的媽。她对老大媽說：“奶奶，你想想，从前的保甲长是哪样人当，可有我們貧苦农民的份？現在是我們的天下，党和社員信任我們，才叫我們当干部。我們不当，难道让过去欺

压人民的保长、甲长当嗎？从前，你家过的什么日子，記得人家挑你的穿心盖（把手脚扎在一起，用杠子抬）嗎？現在又过的什么日子……”老大媽是受过苦的人，在李凤英的耐心教育下，慢慢想通了，不再和儿子鬧气了。經過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少数不大关心集体生产的社員，也有了轉变。

这个队还結合着每个时期向国家交售农副产品，对社員进行工农联盟的教育。每到應該交售某一种农副产品的时候，总有少数社員反映出一些思想問題。例如，有的社員交售肥猪，願意交宰了的，好留点肚杂。针对这种情况，党小組和队委会不断帮助社員回忆国家的关怀和扶持，說明工业化給农民带来的好处。上蒜这个地方，解放前水利条件很差，要水的时候沒有水，不要水的时候洪水淹庄稼，真是三年两不收。解放后，人民政府帮助兴修了小型水利，安装了抽水机，继而兴修了柴河水庫，使得整个公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田灌溉有了保证。去冬今春严重干旱，因为有了水庫，田照样泡，秧照样育。社員說：“要是在过去，这会儿連吃水都沒着落了。”另外，队上还使用了化肥，由拖拉机站代耕了田地。經過这样的对比教育，社員大都能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李明春說：“我們如今是住在‘龙’嘴底下啦！多收的粮食是国家給的！”馮会仙說：“我們使个頂針都离不了工业化呀！不支援国家建設，还有良心嗎！”

經常的、生动的政治思想工作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队里的絕大多数社員都有比較高的觉悟。他們热爱集体，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和为队里出策献計。平时干活計，不管干部



在不在場，质量和数量都不錯。今年四月下旬第一次評比，有十五名社員光榮地被評選為模範社員。

經常的、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同样表現在四隊社員积极支援国家建設方面。以一九六二年来說，第四生产队比較好地完成了各項农副產品交售任务。粮食征购任务全部完成。烤烟交售任务是一千四百八十斤，交售了一千五百多斤。合同上訂的卖给供销社鴨子一百四十只，实际卖了三百一十只。今春收得棕片二百六十搭（每搭十叶），除挑出二十一搭較差的搓绳外，其余的都卖给了供销社。去年社員卖给国家的猪共八

头，其中多数是活猪。

上蒜四队被評選为模範生产队的消息，使得全队社員十分振奋。社員們到处議論着这件喜事。社員們根据模範生产队的标准，檢查修訂了本队原訂生产計劃，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生产队的計劃落实后，社員也紛紛开家庭会，制定爭取当模範社員的計劃。

現在，在上蒜四队出現了新的生产热潮。在干部的帶領下，社員的劳动出勤率很高。全队社員下定决心，要把模範生产队的光荣称号保持住。

老貧农的本色

李廷凡 錢 进

翁信，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李俊人民公社魏团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副队长。在旧社会里，他从十二岁起直到二十六岁，都给地主放牲口、当长工。后来，他回到魏家团庄自己种地，一心想創家立业。可是他終年辛勤劳动，还是吃不飽，穿不暖，一年四季不得不给别人打短工。一九四七年八月，伪保长魏三江借口說他没有按时交粮，一頓柳棒打得他險些喪了命。这些往事，十几年来他一直沒有忘記。他常說：可不能忘了过去，过去的貧苦农民，誰能照管得了自己？現在，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依靠集体經濟，貧苦农民的生活才越过越好。就是这样，翁信从当飼养員，

直到当了生产队副队长以后，始終保持着老貧农勤劳刻苦和維護集体利益的本色。

日夜辛劳为集体

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間，翁信負責飼养集体的牲畜。每当社員們套車的时候，翁信总是一面忙着給大家搭配牲口，一面提醒大家要爱护牲口：“在路上，千万不要乱打；快到卸車的时候，不要攆着跑。牲口回来，我們可要檢查呢，哪一头牲口有个一差二錯，可要找你們算賬！”

車队出发以后，翁信就帶領着飼养員們墊圈、扫槽、鋤草。到晌午，車回来了，卸



了套让牲口打完滚，他连忙拿起扫帚、抓子，给骡马扫土、抓痒。后晌，他又是扫槽、锄草。黄昏卸车以后，他又组织大家给牲口添草、饮水、喂料。他就是这样整天忙个不停。他经常对饲养员们讲：喂牲口的时候，要注意口老的对口老的，口轻的对口轻的；嘴快的对嘴快的，嘴慢的对嘴慢的；瘦弱的单另喂养。还要注意哪匹马吃草肯噎，哪个牲口饮水爱呛，哪个性暴，哪个老实，……他谈起来就没个完。他还常对饲养员们说：“经营好我们的千来亩田，离不开这几十头牲口，饲养好牲口，我当组长的有责任；大家也有责任，咱们要时刻经心，不能叫牲口出毛病。”饲养员们学习他的经验，工作也干得很出色。

马无夜草不肥。到了夜里，翁信还是很忙碌。他一会儿走进草棚，一会儿来到槽头，左臂挽着草筐，右手提着马灯，挨个给牲口添草。听着牲口吃草的响声，轻轻拍着牲口的脖子，看着它们吃草的神态，他笑在嘴角，喜上眉梢。他回想办初级社的头一年，只有四匹马、四条牛、五头驴。当时一些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讥笑说：“这些穷棒子，牲口没牲口，车没车，还想办社哩！……”谁知集体的家业发展得这么快，只几年功夫，就槽头兴旺，骡马成群。他乐呵呵地好像总是没有瞌睡，每天夜里都要起来几次给牲口添草。

翁信爱护集体财产，有时连生命危险也不顾。有一年夏天，社员翁虎拉上白骡马到李俊堡去。刚生下七天的小马驹，活蹦乱跳地跟在后头。刚走到双渠桥上，翁信在远处突然发觉小马驹不见了，他立刻飞奔桥头，一把拉住翁虎问道：“马驹子呢？”翁虎回头一看，不见了马驹，心里非常着急。他俩往四周寻找，发现马驹掉到渠里了。翁信急

忙把衣服一脱，一个猛子扑到渠里。浑水一呛，他一头碰在桥桩上，嗡的一下子头昏了。他在迷迷糊糊中，摸到了马驹，两手紧紧抱住它。马驹挣扎着，翁信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把马驹救上岸来。这时，翁信脸色苍白，昏迷地倒在岸边。过了一阵，他苏醒过来，一睁眼就问道：“马驹怎么样了？”

凡是不利于集体的事，他只要看见了，都要管。一天黄昏，他刚喂完牲口，就扛上铁锹向稻田走去。奇怪！一块该淌水的田连田口子也没开。他急忙跑到负责淌水的社员家去查问。原来那个社员熬累了正在睡觉呢。翁信立刻喊醒他批评说：“你睡觉事小，粮食减产事大。今儿洪水下来了，正是淌好水的时候，不淌等到几时哩？”“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一席话把那个社员给说笑了，接受了翁信的意见，赶到田里去淌水。

勤儉節約不忘本

翁信入社以后，就把社当作自己的家，凡是对集体有利的事，不管有多麻烦，他总是高高兴兴地主动去做；处处注意勤儉节约，爱护一草一木。他喂完了牲口，一有点空就到田头去，看庄稼长得怎么样了，哪些田该淌水，哪块田该薅了，随时提醒队长；发现社员忘在田头的犁、耙、绳索等物件，他都收拾回来，交给保管员。平时在路上见到一个钉子、一块木板、一根烂绳子，他都要拣起来，保存好。遇上牲口的缰绳断了，龙头烂了，或是车上哪个地方该修理了，翁信平时收拾的那些小东西就用上了。他还拿他收拾来的一部分破烂，到供销社废品收购处换成铃铛，给牲口挂上。社员们赶上车，铃声叮当响，就是天黑赶路，也便于互相照应。大伙都夸奖老



翁是个細心人。有时候，队上的麻包烂了，或有什么别的針綫活，翁信就拿回家去，让他老伴給縫縫补补。就連社員們碾米磨面的事，他也管，只要事前作好安排，他就按时把牲口送到磨道里；有些妇女不会套牲口，他就給帮忙。翁信在一年里，不知道要做多少这些“份外”的事。可是，他一不要队上給他評工分，二不是为了叫人夸奖。他以自己能为大家多干一些活，多出一把力，而感到愉快。

在他的带动下，整个飼养組很好地發揮了劳动积极性，为集体节省了开支。夏天，他帶領飼养員打草放牲口；飼养場的圍墙坏了，他不要队上派人，发动飼养員自己打圍墙；“窝棚”也是自己动手盖；拉土垫圈，他們也自己干。农忙收割或播种的时候，他經常抽出两个飼养員去帮忙。翁信常向大家說：“我們过去都是貧雇农，在旧社会，大家穷得炕上連張席子都鋪不起，吃了上頓飯还不知道下頓在哪里！迟解放两年，我們有些人連命都要保不住。現在我們过的啥生活呢？鋪有鋪的，盖有盖的，家家都有四、五床被子，誰家也不缺吃少喝，存的錢用不完。你們說，是过去好还是現在好？”飼养員們被說得眉开眼笑，他們在翁信的启发和鼓励下，更加热爱集体，越干越有勁。

胸怀壮志挑重担

翁信爱上了飼养員这个崗位，积累了飼养牲口的丰富經驗，下定决心当一輩子飼养員。可是在一九六一年年底，他被全队社員选为副队长。开始，他有点顾虑，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沒經驗，怕領導不好。但他想到：在党的领导下，今天建設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應該为群众多出些力。大

家既然选我，就是相信我，就不能辜負大家的希望。从此，他肩上的担子挑得更重了，心也操得更多了。

去年四月中旬的一个晚上，第三生产队的干部在一起开会，討論如何解决稻田缺肥問題。會計翁光礼拿起算盘，啪啦啪啦撥了一陣，向大家說：“不管怎么算，还缺三百八十多亩田的肥料。”队长梁占祥說：“稻田缺这么多肥料，大家看咋解决？”干部們議論开了，有的說发动社員打蒿子漚綠肥，有的主張挖湖泥，还有的提出把大队的羊群赶到田里踏粪积肥。翁信坐在鋪盖上，不住地抽着旱烟，皺着眉头沉思。梁占祥轉身問他：“翁队长，你也說說，这肥料到底咋解决？”翁信說道：“我也琢磨半天了，打蒿子、踏粪，都解决不了多大問題，挖湖泥倒是个正經主意，我算着挖湖泥足够解决稻田缺的肥料。你們領上大家干旁的活，我領上少数社員挖湖泥。”話未落音，大家哄嚷开了：“哈！你这么大的胆子，几百亩大的稻田，騎上馬也要跑半天呢，到啥时候才能把湖泥送到稻田里？”“湖泥全是稀糊糊，車都下不去，一天能挖多少，我們有多大力量？”梁占祥也半信半疑地笑着問他：“你真的敢包下来？”翁信斬釘截铁地回答：“梁队长，你掌握全盘，拉湖泥你就不用管了。給我十輛車，十几个小伙子，到时候一定完成任务。”梁占祥笑着追問：“你这个眼是咋算的？”翁信一板一眼地答道：“一輛車一天可以拉二十几車，靠湖边的地，一天能拉六十多車，每亩田平均上二十車湖泥，十輛車一天总能拉它二十多亩田的肥料。滿打滿算，半月、二十天也就够了。”

第二天，翁信領上十几个精壮小伙子下了湖。湖泥又黑又臭，翁信鼓励大家：“这里



真是個肥料棧，大家鼓勁干，今年丰收就靠它了。你們誰敢和我比賽？”團員侯光首先響應：“比賽就比賽，我們年輕人咋說還不如你？”翁信笑着說：“別看我老，我干的少了還不算哩。”一群年輕人齊聲叫道：“向老隊長學習！”頓時，大家有說有笑，越干越起勁，一塊塊紫泥飛向湖岸。到收工的時候，看着一堆堆像小山似的湖泥，大家忘記了疲勞。

那些天，運湖泥的社員，五更天就起來，趕着大車，浩浩蕩蕩地奔向稻田。大家哼着小調，唱起秦腔，人歡馬躍，好一派熱鬧景象。別的隊看見了，羨慕地說：“看人家三隊的干勁！”于是他們也套起車，趕忙去拉湖泥。那些日子，翁信起五更，睡半夜，和大家一起，挖泥、裝車，忙个不停。他白天勞累一天，晚上還幫飼養員喂牲口，兩只眼睛都熬紅了。老伴勸他休息一下，他不肯；隊長梁占祥要同他輪換，他也不干。他意味深長地說：“輪換啥哩！解放前我給地主當長工，連天連夜地給地主干活，一年到頭，還是挨餓受凍；解放後才有了吃穿。如今我們辦公社，是為了大伙生活過得更幸福，現在是給自己干，再苦也不怕。不吃苦中苦，哪有甜中甜！”

辛勤的勞動，獲得了豐收。去年他們這個生產隊的稻田平均畝產比一九六一年增產百分之十八。今年，水稻播種按時完成了計劃，麥田比去年擴大了種植面積，莊稼都生長良好，豐收在望。社員們一想到生活一年比一年更美好，就從內心感謝翁信和其他干部的辛苦操勞。

大公無私作表率

解放十多年來，翁信在黨的指引下覺悟

不斷地提高。他懂得了：要使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興旺，干部應當始終不忘黨的教導，經常同群眾保持親密的聯系，處處公正無私，為集體着想，作群眾的榜樣。今年春播前，隊里還有幾十畝麥田缺肥料，原來計劃買糞肥來解決。翁信一盤算，買糞肥一車要幾十元，生產成本提高很多，對集體不利。于是他就建議發動社員向隊里投肥，並首先將自己原打算在自留地用的一大部分糞肥和炕土肥料，帶頭投到隊里。他的模範行動帶動了社員，大家都積極向隊里投肥，幾天時間，社員們就投了二百車糞肥，及時解決了麥田缺肥問題。

一年多來，翁信雖然當了副隊長，可他还是時常幫助飼養員干活，常給牲口治點小病。飼養組長侯彥明總覺得過意不去，在評工分的時候，他幾次提出要給老隊長多評些工分。翁信卻從來不接受這種照顧，他說：“像這樣做點零活，也給評分，那像啥話！牲口喂好了大家使嘛。”提起這些事，社員們總是人人點頭稱贊：“一年里，老隊長哪天不苦在人頭里，可是針尖大的便宜他也不愛。”

翁信最突出的思想作風，就是熱愛集體，熱愛勞動，聯系群眾，大公無私，始終保持老貧農的本色。他在做飼養工作的七年中，每年都被評為模範飼養員。擔任副隊長以後，仍然堅持經常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他已經五十來歲了，但總是揀重活干。一年當中，他除了到大隊、公社開幾次會以外，從來不誤工。去年他實做了三百五十個勞動日，是全隊出勤最多的一個。今年年初，他又被評為模範干部。公社黨委號召全社干部向翁信學習。



“劳动带头干，工作是模范”

申元則 連治水

早先，人們形容羊井底是个“山多树少，坡多草少，沟多水少，人多地少”的穷地方。这个座落在山西省平順县的貧瘠山村，在一九五二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前，要說地盘可不小，差不多有两万亩；要說耕地却不多，全村平均每人只有一亩多地。成立互助組以后，依靠集体劳动，粮食产量虽然比单干时有所提高，但是，正常年景，每亩也只能收二百五十来斤，多种經營的收入也很少。在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以后，經過十一年的艰苦奋斗，这个貧瘠山村的自然面貌已經改观，农、林、牧、副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全大队一九六二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九点七；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五百一十斤；农、林、牧、副业总收入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四点七倍。現在，周圍村子的群众称赞羊井底是：“高山松柏核桃沟，河边两岸垂楊柳，山腰梯田加五果，低山緩坡牧草稠，牛羊成群風景美，农林牧副齐丰收。”

提起羊井底由穷变富的原因时，社員們異口同声地說，这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大家齐心合力，奋发图强，充分發揮了集体經濟优越性的結果。同时，这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羊井底人民公社主任兼羊井底

生产大队大队长武侯梨同志，十一年如一日，始終坚持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领导生产，也是分不开的。

貧农出身的武侯梨，一九四四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〇年，他以身作則带头劳动，领导互助組发展生产，特别是植树造林成績优异，被选为全省的林业劳动模范。以后，他又领导群众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办人民公社。从一九五二年以来，武侯梨虽然身兼数职，經常外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可是，他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带头参加集体生产，被誉为集体劳动的模范。十一年来，他每年都做很多劳动日，一九六二年做了二百三十四个。武侯梨經常这样說：“咱是劳动人民出身，是共产党员，劳动是咱的本分，不劳动就要脱离群众。”所以，他除了外出开会以外，一有工夫不是上山，就是下田，同社員一起劳动。平时，想在村里找到他是很困难的。如今，他已經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可是，劳动劲头賽过年轻人，在劳动中总是拣重活干。今年春天，大队决定进一步挖掘增产潜力，給远地增施肥料。往远地运肥，路窄坡陡，很費力气。武侯梨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牛双景同第一生产队的社員們一起，往全大队路最窄、坡最陡的“小牛腿”（地名）地里运肥。在运肥中，武侯梨不仅担得多，而且走得快。在武侯梨和其他干部的带动下，参



加运肥的社員們勁上加勁。結果，三天的运肥計劃，两天加一个早上就完成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因此，社員贊揚他是“劳动带头人，工作是模范”的好領路人。

武侯梨从自己的實踐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不下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做不好工作的。他說：“領導要实际，天天要下地，三天不下地，領導不实际。”这是他多年来的經驗总结。曾經有过这样一件事，大队决定修一百亩梯田，十一月中旬开工。开始时，大队干部只是做了一般的布置，沒有同社員一起参加劳动。开工后的第三天，第一生产队队长刘連弟汇报說，第一生产队每天出动九人，三天修成梯田一亩。武侯梨和党支部書記听了汇报认为成績很大，當場表揚了他們，并且通过黑板报、广播筒向全大队进行了傳播。事后，經過深入檢查，发现这个生产队每天只有三人出勤，修成的梯田，虽然够一亩，但是，质量比規定的标准差得很远。从这件事情中，武侯梨深深地認識到：土地由社員种，庄稼在田里长，經驗从基层来，問題也在那里出。要使自己的領導工作做得更加切合实际，达到正确指揮生产的目地，就必须經常到田間去同社員一起劳动。只有这样，在指揮生产上，才可能真正做到“知天知地知庄稼”，在做人的工作上，才可能真正做到“知人知面又知心”。

农村基层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是他們的本分，而且也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但是，仅仅認識到带头参加劳动的重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正确处理工作和劳动的关系。对农村基层干部來說，参加集体劳动和領導生产，本来是一致的，但是，如果

安排不善，也会发生某些矛盾。原来，羊井底生产大队有些干部由于不会安排工作，經常不能下地劳动。他們說：“反正只长两只手，顾了調泥，端不了坯；做了工作，下不了地。”还有的干部說：“咱是土里生土里长，誰还不会和土疙瘩打交道，就是工作纏得下不了地。”也有的干部說：“白天桌上趴一天，晚上熬上半夜眼，就凭良心吧，还不給咱記个劳动日！”也有的干部每天光顾埋头劳动，丢掉了工作。为了解决参加劳动和做好工作的矛盾，武侯梨通过多年的实践，逐步摸索到一套“五結合”的办法，即：集体领导和分工負責相結合，依托重点和指导全面相結合，調查研究和解决具体問題相結合，定期开会和田間商量相結合，带头劳动和現場指導相結合。这个“五結合”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党一贯提倡的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導相結合、領導和群众相結合的方法的具体运用。

第一，集体领导和分工負責相結合。有些大队干部由于管事过寬，不但农、林、牧、副业生产中的各种問題都得由他們来解决，而且社員生活上的婚喪大事、家庭糾紛等問題，也要找他們处理，因此，跳不出事务圈子，不能很好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武侯梨研究了这种情况以后，为了更好地發揮集体領導的作用，使干部騰出更多的時間参加劳动，就向管委会建議，根据集体领导和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原則，在管委会的委員中，按农、林、牧、副业和青年、妇女、武装等系統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使每个干部各負其責，各行其事。并且規定，凡是在自己职权範圍內的事情，发现一般問題，个人有权解决；凡是屬於較大的問題，就集体研究处



理。另外，还具体规定，主要干部每旬三、六、九日晚上碰头一次，每月一次“回头看”，检查总结上月工作，布置下月工作。这样，既加强了集体领导，发扬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又保证了每个干部都能抽出一定时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特别是武侯梨本人，由于把大队工作的担子，分担在各个委员的身上，就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同社员一起劳动，在参加劳动中领导生产。

第二，依托重点和指导全面相结合。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武侯梨为了照顾全面工作，曾经有一个时期，忙着到处跑。虽然和过去一样，跑到哪个生产队，就同哪个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劳动，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却放松了培养重点的工作，不能“以点带面”，更好地推动全大队的工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就把第二生产队作为自己指导全大队工作的“根据地”。不论春耕夏锄，还是秋收冬藏，他都首先在这个生产队做出样子，带动其他生产队。例如，在一次垒谷坊中，他先在这个生产队里，亲自动手垒了一条质量很高的谷坊，并且摸索出垒好谷坊的方法，拟出了劳动定额。接着，就召集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到现场参观。这样，不仅把垒谷坊的经验推广到全大队，而且对那些干活不讲究质量的社员，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社员耿二则和刘小金，在参观以后说：“不怕不识字，就怕货比货，看了侯梨垒的谷坊，我们那条非返工不行。”他们回去以后，便自动返工重做。

第三，调查研究 and 解决具体问题相结合。武侯梨在参加劳动过程中，十分重视了解情况，根据社员的意见和要求，来考虑全大队

的工作。他除了在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了解情况以外，还经常抽空到其他几个生产队检查工作和了解情况。所以，他在领导生产中，情况摸得准，问题解决得透。一九六二年春耕下种时，他发现第七生产队进度缓慢，便深入到这个生产队，一边劳动、一边调查访问。经过深入了解，弄清这个生产队春耕进度缓慢是因为耕畜瘦弱，肥料送不出去，土地耕不过来。于是，他一面鼓励社员积极克服困难，一面和大队管委会研究，从大队临时抽调了三根耕畜，帮助他们进行春耕，及时完成播种任务，为秋季超额完成包产任务打下了基础。事后，武侯梨深有所感地说：“经常深入实际，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根底底，要是脱离了劳动，只能摸到问题的毛毛皮皮。”

第四，定期开会和田间商量相结合。前几年，这个生产大队开会过多，曾经影响大队干部不能更多地下地劳动。为了解决会议占用时间过多的问题，武侯梨和党支部研究以后，采用了定期开会和田间商量相结合的办法，适当减少会议的次数，缩短开会的时间。例如，规定每月定期召开支委会和管委会各两次，除党员、团员按期开会过组织生活以外，其余会议一律要经过党支部或管委会的批准才能召开；农忙期间，除特殊情况以外，一律不准召开群众大会。每年的生产计划、分配方案等重大工作事项，他们多半是先在定期会议上，研究出初步意见，然后，由分管各生产队的大队管委会委员，分头到各生产队去传达，结合田间劳动和利用大伙一起吃饭的机会，广泛征求社员意见，最后，再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修订。

第五，带头劳动和现场指导相结合。队



干部既是普通的劳动者，又是生产的指挥员，既要同社员一起劳动，又要在劳动中领导生产。所以，干部下地不能只顾埋头劳动，放松领导者的责任。对于这一点，武侯梨认识得很清楚，做得也很好。他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同普通社员一样，能够服从队长的指挥，认真完成队长分配的劳动任务；和社员打成一片，有说有笑，毫无隔阂。在生产队长和社员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毫无架子。同时，他在劳动中又能及时发现問題，帮助生产队长出主意、想办法，进行现场指导。这样，不光以身作则影响和带动了一同参加劳动的社员，同时，还帮助生产队干部提高了工作能力。一九六二年秋天，阴雨连绵，秋耕不能按时开犁，眼看快要上冻了，全大队还有一半秋地没有耕过。天晴以后，武侯梨向第二生产队队长武全保建议，除了要发挥现有耕畜的作用以外，还必须组织劳动力突击刨地。武全保接受武侯梨的建议，一方面改变了耕地牲畜一天回家两次的习惯，采取上地带草料的办法；一方面组织了二十个男女社员突击刨地，并且让武侯梨亲自带领一个作业组包干完成。不料，在秋耕任务接近完成时，又下起雨来，有些人不愿再继续刨下去。这时，武侯梨一面向大家说明不耕完地的害处，一面以身作则冒雨刨地。在他的带动下，其他社员也跟着继续干，经过三天的紧张劳动，按时完成了秋耕任务。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雪，土地封了冻。社员看到遍地白雪，感激地说：“要不是侯梨带领大家冒雨突击，今年的秋地可耕不完。”武侯梨就是这样把参加劳动和领导生产密切结合起来。

武侯梨由于运用了“五结合”的工作方法，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领导全大队办好集体经济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在参加劳动方面，每年给他评定的定工劳动任务，总是超额完成。队里给他评定的补贴工分，他从不多要一分一厘。一九六二年，全大队有二百三十二个社员，因为超额完成了“三投”（投工、投肥、投草）任务，受到了大队的奖励，武侯梨也是其中的一个。在领导工作方面，他每年除了抓紧当年生产以外，在农田基本建设上，按照十年规划，每年都要重点办好一件事。所以，人们说羊井底自从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一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到一九六二年，羊井底生产大队在一九五三年制定的十年建设规划，已经胜利实现，武侯梨又一次代表大队出席了全省的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羊井底生产大队被评为特等先进单位。武侯梨为什么能够成为群众的好干部？副大队长武喜存说得好：“论写写算算，说说道道，村上数不着他，可是，要论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数他高。这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侯梨能经常和群众滚在一块，贴着身子实干，实际情况了解得透，底子摸得清，说的话，句句在群众心上，出的点子，个个合群众心意。”

在武侯梨的带动和影响下，羊井底生产大队的其他干部也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减少了补贴工分。一九六二年，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的补贴工只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九五。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一步密切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改进了干部的工作作风，集体家业管理得很好，全大队呈现出一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旺盛景象。



身份是社員，劳动是本分

孙汝純 毕可友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山东省文登县高村人民公社社长兼生产大队队长張富貴，从一九五三年办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十年如一日，始終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現，以身作则，带头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受到社員的热烈贊揚和爱戴。

張富貴早在一九四四年，就以劳动出色和领导互助組取得优异成績而当选为胶东解放区的劳动英雄。从那时以后，他始終站在群众的前头，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带领大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从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張富貴虽然身兼数职，工作任务相当繁重，每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都要占去一百天左右，可是他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社員一起劳动。据統計，一九六〇年他担任公社社长时，参加劳动一百八十天，一九六一年回到生产大队工作，劳动了二百六十天，一九六二年参加劳动二百二十天，三年中平均每年参加劳动的时间都在二百天以上。

張富貴常說：“领导生产咱是干部，干起活来咱就是社員，就得和社員一样地干。”一九五五年春天，在村北的一块地里打井，挖下半尺深就是乱石，坚硬难刨，鐮头下去震得手发麻，挖了近两丈深还没有見水，有的社員主張填死，另选择地址。但是，全村八百零九亩

土地几乎全是这样。为了坚持繼續挖下去，張富貴开始时和社員一起輪流擲土，到后来自己把起鐮来，把擲土这件較輕的活让給別的社員干。有人发现他用力猛，两手的“虎口”都震裂了，流出鮮血，便从他手里搶过鐮来。可是他擦擦血，用布条纏了纏，又繼續掄着鐮头刨起来。最后，一直坚持到把这眼三丈多深的水井砌成。社員倪玉才說：“沒有点硬骨头，沒有点毅力，这眼井是打不成的。”

一九五九年，張富貴为了取得改碱、治澇的經驗，指导全面工作，他深入到岭上大队，和社員們一起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过填洼、挖渠，把这个队的七十多亩高低不平的澇洼碱地整好。接着，又展开了压沙活动。每天早晨天不亮，他就起床，到往返四里多路的河里运沙，一个早晨运八、九趟。在他的带动下，十九名青年，由平均每天运十五趟，增加到二十三趟。四十亩碱地压沙九千六百車的計划，仅用二十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比原訂計划提前十一天。一九六一年以后，他被派回生产大队兼任大队长，固定在第一生产队参加劳动。对于队里分派的活，他从来都认真地完成，并尽力爭取超过。去年秋季，队里为了儲备飼草，規定每个劳动力割草四天。張富貴和其他社員一样，积极参加割草，提前完成了四天的任务。接着他



又要队长分派给他相当于三个劳动力的割草任务。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副队长隋桂生就上山了，满以为自己是最早的一个，可是到了那里一看，张富贵在月光下握着镰刀，已经割了半条草堰的草。在五天时间内，张富贵一个人就交出了饲草四千一百五十多斤，超额完成了任务。社员倪洪信说：“别看咱们的老模范年纪大，干劲可不败！”

张富贵在劳动中，总是见困难就上，拣重担子挑。去年春天，队里向村东北井湾子一带地里送粪，有的社员嫌上坡吃力，不大乐意干。张富贵本来负责刨地，可是在听到这种反映后，就主动把刨地的活让给别人，自告奋勇地参加运肥。别人驾着胶轮车，他却驾起一辆木轮车，一连运了两天，头一天推了三十六趟，第二天推了四十三趟，都大大超过了定额。去年冬季，张富贵和生产队长倪玉华带领一帮社员去挖水渠，有的社员嫌冷，不愿下去，这时，他们二人卷起裤子脱下鞋就先下去了。其他社员见他们二人下去，也都跟着下去了。

张富贵带头劳动的模范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干部和社员。一天，社员隋夕泽对他讲：“你是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又是公社社长，何苦还这样撒腿拉手地干？”张富贵却回答得很干脆：“我的身份是社员，劳动是本分。如果照你这样想，大家也就不会选我当干部和模范了。”

张富贵出生在一个三代扛活的贫农家庭里，从小就死了娘，父亲也因为逃荒死在外面，幸亏伯母抚养了他。他十三岁时，开始给地主家放牛。后来在地主倪玉岱家扛大活时，曾光着脊梁，淌着汗水，被迫为地主在

一天里割过七亩小麦。但是，当他向这个地主提出借二、三十斤玉米来维持家庭生活时，却被拒绝了。张富贵为此伤心地躲在一边擦眼泪。一九四〇年八路军解放了他的家乡，张富贵的生活才好起来。他的伯母在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说：“孩子，不要忘了咱的生活是怎样好过来的，不要忘了财主家把我纺花挣的二亩地抵押了去，是谁帮助咱要回来的。我死后，你要听八路军的话。”

在党的教导下，张富贵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牢固地树立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位名叫隋夕太的老社员见张富贵上了年纪还这样猛干，曾多次对他讲：“光社里、队里的工作就够你忙的啦，你少干点没有关系，没有人跟你攀比。”可是，张富贵却说：“咱是劳动人民出身，能劳动不劳动，就是忘本。再说，当干部不劳动，又怎么能领导好生产？”

张富贵从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参加生产，才能领导好生产。”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的时候，由于摊子大，事情多，加上他的老婆有病，半年的时间只干了二十个劳动日。有一次，他检查生产时，老远就听见锄玉米的两个社员在说他。一个说：“大官来了！”一个说：“张富贵现在摆摆洒洒的，真是当上甩手掌柜的了。”社员的这一批评，给张富贵敲了警钟。“甩手掌柜”这句话，使张富贵想起了农民对那些不劳动光剥削的地主阶级的仇恨，又想到大伙选举自己当模范和干部，不也就是因为自己劳动好吗？从社员的批评里，张富贵找到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他深深地感到这一段时间自己参加劳动太少了，并且意识到这就是脱离群众的开始。于



是，他首先在全体党员会上作了检讨，接着又在全体社员会上作了认真的检查；并在党的帮助下，妥善安排了社里的工作和家务，重新和社员在一起，铺下身子干起来。从此以后，他在检查生产时，生产工具总不离身。他看到社员倪秀远锄地瓜地时用力小，扶不起耩来，就不声不响地帮倪秀远锄，锄过几垄之后，才对倪秀远提出意见。到了晚上，张富贵再去看时，倪秀远锄的地瓜地，质量完全合乎要求。这一年的下半年，张富贵干了一百二十多天活，社员的反映好了，工作也好做得多了。

张富贵身兼数职，既是省、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又是省、专区、县三级农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公社社长兼生产大队队长，需要经常外出开会。可是，张富贵却认为时间是受人支配的，只要有心劳动，好好解决劳动和工作的矛盾，就能挤出时间劳动。他不仅对整工夫抓得紧，而且充分利用零星时间，有空就干。今年三月间，他在济南开完省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仍然放下背包，拿起镢来赶到地里干活。社员倪永振关切地说：“你刚到家，也该歇歇呀！”他却说：“离天黑还早，大伙都在地里，我在家也呆不住啊！”平日社里或队里开会，只要会前会后还有时间，他也总是要和社员干一阵儿。去年秋天公社开会布置秋种，他天不亮就去刨地，到吃早饭时已刨了二分，在地里吃完早饭，把镢交给社员，就赶到公社去开会。会议结束后，社员还没收工，他又去刨了一分多地。这天，他虽然开了一天会，仍旧干了半个多工的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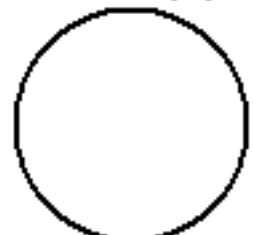
张富贵在劳动中，经常和社员谈心，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根据社员们的意见和要求去考虑全队的生产和工作。他虽然固定在第一生产队参加劳动，但是在上山和回家的路上，在休息的时间，经常到其他几个生产队去检查生产，因此他对全大队的整个生产情况了解得很及时。去年春天栽地瓜，他发现第一队栽得很稀，又到第二队去看看，第二队又栽得过密，唯有第三队不稀不密正合适。经过同社员进行研究和比较，才知道这是由于各队的劳动定额不一样，从而帮助第一队和第二队很快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保证了栽地瓜的质量。

张富贵同志十年如一日地带头参加劳动，在干部和社员中有很大的影响。大队党支部书记隋夕荣深有体会地说：“以前我每逢看到张富贵了解情况多，能及时提出工作中的问题，总觉得是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如他。如今铺下身子干，和社员打成一片，不光了解情况多，领导生产具体，社员对咱的态度也好了，我这才知道带头劳动的好处。”隋夕荣虽然身体不太好，去年还干了一百六十二天活。党支部书记何孔洲，劳动一百九十天。大队会计隋永生，劳动一百八十五天。妇女大队长迟人荣（军官家属）去年在家七个月，参加劳动一百二十天。社员王玉英和她一起干活时对她说：“你少干点怕什么？就是不下，玉杰哥（迟人荣的丈夫）还不掏钱给你吗？”但她却一本正经地说：“不能这样说，你看看咱社长，论年龄比我大，论工作比我多，他还那样使劲干哩！”全大队三个生产队长，也都分别干活二百八十天以上。张富贵的不辞辛劳、铺下身子干的行动，已成为人们学习的好榜样。



始終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

· 郑 际 雄 ·



“学好样，看好样，社員看的干部样。”这是上海市宝山县吴淞公社張建浜生产大队社員称赞大队干部劳动好的一句顺口溜。

常年坚持参加集体劳动

張建浜生产大队共有二百八十一户，一千二百七十六人，五百六十三个劳动力，一千五百二十四亩耕地，是个夹种粮棉、蔬菜和果树的大队。这个大队的六个干部，两年来，在党的教导下，以普通社員的身份，常年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在生产中领导生产。一九六一年，六个干部平均每人做了一百九十八个劳动日，其中党支部书记潘东才做了一百九十二个劳动日，副书记金祥其做了二百一十一个劳动日，大队长应妙根做了四百六十八个劳动日。一九六二年，六个干部平均每人做了一百七十个劳动日，其中潘东才做了二百零四个劳动日，金祥其做了二百四十九个劳动日，应妙根比上年工作忙一些，也做了一百八十九个劳动日。

他們不仅經常参加集体劳动，而且在劳动中拣重担子挑，做出榜样，带动社員搞好生产。今年春播时，潘家宅生产队为了不誤农时，决定把一部分棉花套种在油菜行里。队里有些妇女，嫌这种农活干起来麻烦，个个

摇头，嚷着油菜早已封行了，說啥也沒法走进去套种。潘东才知道了，笑了笑，就領着妇女們下田去踏看。刚到田里，一轉眼，老潘就不見了。原来他钻进了又高又密的油菜丛，跪在油菜行里套种，前面用手撒棉籽，后面用脚膝将泥土盖上，种得既快又好。不一会儿，种好了一行，他钻出来同大家討論这个办法。这一来，大家心里一亮，劲头也来了，终于按质按量地完成了棉花播种任务。社員們都称赞老潘，說他这样做，比开上一天会还有效得多。姚华浜生产队干部何阿利最近还談到一桩事情：一九六一年五一节那天，队里休假，他一早就动身去走亲戚，路过潘家宅，看到潘东才一个人在队里的茨菇田里翻地。到了傍晚，何阿利从亲戚家回来，潘东才还在翻地。走近一看，一亩五六分田全部翻了过来，說明潘东才已經扎扎实实干了一天了。何阿利走上前去，說道：“老潘，你連休息日子也不歇一歇，太辛苦啦。”潘东才却笑着回答：“社員比我們还辛苦，抽今天有空，順便照顾一下田里，有啥辛苦。”

大队的其他几个干部，学着支部書記的样，干活也都出色。去年秋种时，譚家宅生产队的油菜，移栽进度很慢，眼看要誤农时了。大队长应妙根赶到他們那里去了解原因。



队里的人说：“油菜种在稻畝田里，稻畝太硬，翻也翻不动，只好拖几天，等下场雨再说。”应妙根听了，也不多说话，顺手拿了把铁耙，邀大家到田里试试看。到田里，应妙根用劲翻了一阵，感到农活确是很吃力。他同社员们商量，等天下雨是靠不住的，还是现在多花一些力气，早动手的好。社员们同意他的意见，当场一齐动手翻地，应妙根和大家一起干了一整天。第二天，社员以为大队长今天总不会再来了，谁知道大清早赶到田头，就看到妙根已经在那里干活了。到了第三天，应妙根还是和大家一起翻地，而且越干越有劲。大队干部带头干活，鼓舞了社员的生产干劲，很快就把油菜移栽好了。

“千万不能忘了老本行”

这个大队的干部为什么劳动这样积极呢？说起来有一段曲折。

一九六〇年以前，这个大队的干部劳动并不经常，在大队办公室常常有三、四个干部，有事办公，无事聊天；到生产队去，也只是看到有啥问题，就在田头指指点点，说完了转身就走。这里离吴淞镇很近，干部常常溜到镇上去逛，社员意见很多。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潘东才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共产党员，又是种田出身的，党教导他，当干部一定要参加集体劳动，因此在开始时，对干部不参加劳动有些看不惯，可是过了一阵，也就习以为常了，并且渐渐地认为，当了干部，是要有干部的“样子”，否则没有威信，工作不好办。不久，他到一个生产队去帮助工作，社员在劳动，他

蹲在田岸上，把生产队的干部叫在一旁，商量问题。当时大家待他很冷淡，他也很不自在，一双手好像没处放似的。隔了几天，他又要到那里去，心想还是带上件把农具，凑和着同社员一道干点活。可转念又一想：“当支部书记的带件农具东跑西转，干部、社员看见不会笑话吗？”犹豫了一阵，还是把镰刀带上了。可是，为了怕人在路上看见，把镰刀藏在自行车车袋里。到了队里，他马上拿出镰刀来和社员一起割稻，社员看到支部书记到队里来干活，态度也变了，同他有说有笑。

从这次以后，潘东才时时都把劳动惦记在心，到生产队去，总要带着农具。参加劳动多了，社员待他也更加热情了，而且乐意把心里话都告诉他。有一次，潘东才在田里劳动时，同几个老农聊天，问起对大队有啥意见。老农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顶大的意见，就是有几个大队干部“架子大”，不是办公室坐坐，就是东荡西溜，劳动太少。听了这些话，潘东才更感到这是个大问题，于是在大队干部会上提出来，要大家讨论。

一开始，有的大队干部认为，这意见说来虽不错，不过当了干部，责任不同，再要参加劳动，一来会影响工作，二来自己还像什么干部。大队长应妙根还赌气地说：“我本来是农民出身，又不缺手拐脚，做干部不行，干脆回去劳动吧。”潘东才看到大家的情绪不对头，便先从自己谈起，一五一十地讲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还耐心地說：“当干部的，责任是不同，社员要积极劳动，我们除了劳动还要工作，还要把大队的事办好，担子很不轻。不过大家想想看，像现在这样不参加劳动，和群众联系不好，问题发现



不了，社員對我們有一肚子意見，工作能做得好嗎？”

經他這麼一說，大家慢慢地心平氣和了。他們一邊學習黨的有關文件，一邊就熱烈議論起來。好幾個人都談到：老潘勞動多，社員就歡迎他。我們現在到隊里去，有時說些什麼，隊幹部、社員常常聽不進去，現在想起來，是對我們不勞動有意見。黨支部副書記金祥其過去是個勞動的好手，這一陣，對勞動也放鬆了，他慚愧地說：“社員選我們，一來是相信我們能先公後私，二來也因為我們是勤勤懇懇的種田人，能和大家同甘共苦，搞好生產。我們當了幹部，千萬不能忘了自己的老本行。”大隊長應妙根也感到了自己的不是，他說：“解放前，我受盡了地主、反動派的剝削欺凌，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如今當上了幹部，沒有好好勞動，把工作搞好，這是落了疤疤忘了痛，實在不應該。”經過互相幫助啟發，回憶對比，大家認識有了提高，都表示一定要積極勞動，做好工作。黨支部委員會並作出決定，要求黨員幹部改變作風，參加生產，領導生產。

“鐵要打，人要煉”

黨支部的決定作出以後，大隊幹部都到生產隊去參加勞動了。開始，大家的勁頭很高，有的挑担，有的翻地。沒有干多久，大家都暗暗吃驚：多時不勞動了，想不到一勞動就這麼疲累。干了兩天，個個都累得腰酸背痛，尤其是挑糞干重活的，夜里躺在床上，骨頭就像散掉了似的。原來以為是種田人出身，參加勞動問題不大，現在感到有問題了。

幾個幹部湊在一起，黨支部委員兼團支部書記曹志英就嚷着：“天天干不行，還是打打雜差的好。”盛阿英還怪老潘太認真，輕快的日子不過，硬要頂了石臼做戲。慢慢地，大家對勞動又放鬆了，辦公室里的人又多了起來。潘東才發現了這個問題，就向大家提出：“身體疲累，這正是久不勞動的緣故，堅持一月、半月就好了。只要不怕勞苦，這一關一定闖得過。”大家感到這話雖對，可是說說容易，做起来却很難。潘東才心里也想，從長久不勞動到熱愛勞動，的確需要一個鍛煉過程。自己是支部書記，就得起帶頭作用，幫助大家過好這一關。他除了安排日常工作和參加有關會議之外，一有空就在潘家宅生產隊勞動，起早落夜，和社員一起挑糞、澆水、翻地、種菜。一個月過去了，在大隊幹部會上檢查勞動情況時，一般都做了一百個工分左右，大家以為勞動得很不錯了，可是一看潘東才的勞動手冊：整整做了二百三十多個工分。潘東才笑着对大家說：“開頭挑糞，肩胛痛透痛透，硬着頭皮干下去，就越干越有勁了。”支部書記做出了榜樣，對其他大隊幹部鼓舞很大。曹志英當場表示：鐵要打，人要煉，老潘這麼忙，還干了這麼多，我們更不應該落后。不久，她在姚家宅生產隊積肥，一連干了好幾天，累得手臂也舉不起，還是堅持下去，後來很快也就習慣了，身體也比從前結實多了。

闖過了艱苦關，大隊多數幹部參加勞動都比較自覺、比較經常了。但是，副大隊長盛阿英一向懶散慣了，還是不夠經常。她勞動一會兒，往往推說要買點什麼，騎了自行車，就到鎮上去逛了；有時就干脆坐在家里划



划表格，填寫數字。社員對她意見很多，說她像“水浮蓮”，飄來飄去。有一回，她在田岸上對社員指指點點，社員就沖撞她，說：“你來干干看。”聽到群眾的批評，盛阿英很苦悶，甚至想不當幹部了。潘東才知道了，就反復幫助她，特地到她家裏，懇切地對她說：“我們是共產黨員，又是幹部，應該嚴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勞動中鍛煉改造自己，怎么能受了點批評、遇到些困難就鬧情緒呢？”同時具體幫她安排了工作，還對她說：“你體力較差，社員都知道，只要自己盡力多參加勞動，社員是會體諒的。”經過潘東才的幫助，盛阿英也有了轉變。不久，她在隊裏插秧，清晨四點多鐘就出工，摸黑才收工，還抽空幫隊裏記工分。幹部和社員們都很為她操心，要她注意身體。得到大家的關懷，盛阿英信心更足了，她把工作安排在晚上做，和社員一起插了十多天秧，從此也積極參加勞動了。

現在，大隊幹部已經養成了熱愛勞動的好習慣，不再感到疲累了。有時候，雖然夜里開會開得比較晚，他們第二天一早還是堅持和社員一起出早工；有時候，上午要到公社開會，也盡量做了早工再趕到社裏去；從公社、大隊開會回來，不管時間是早是晚，只要社員還在田裏干活，他們也下田去勞動，和社員一起收工。他們到生產隊去工作，就帶上一兩件農具，工作到哪裡，勞動到哪裡。

為了常年堅持參加勞動，大隊幹部還實行了定工勞動、定額補貼的辦法。每年年初，

由大隊根據每個幹部的實際情況，提出全年的定工勞動任務及補貼工分總數，由大隊社員代表大會審查通過。大隊幹部每人都備有一份勞動手冊，到隊裏勞動，和社員一樣評工記分。

大隊的幹部都分別固定在一個點裏勞動，為了保證工作和勞動兩不誤，大隊規定幹部及時匯報點裏的生產情況、社員思想情況和貫徹執行黨的政策中的問題，由大隊集中起來，經過分析研究，提出意見，指導全面工作。

“鐵耙不用要生鏽，
幹部不勞動會褪色”

現在，張建浜大隊幹部常常說：“鐵耙不用要生鏽，幹部不勞動會褪色。”事實也確是這樣。幹部堅持參加集體勞動，就能永遠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發揚艱苦樸素的作風，抵制剝削階級思想的侵蝕。這次整風整社，社員對大隊幹部的意見不多，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幹部在勞動中同社員打成一片，能夠接受社員的監督。幹部一有什麼缺點錯誤，社員就隨時批評、幫助，因此很多問題剛一露頭，就能夠及時得到改正。過去有些幹部用錢不注意精打細算，如今經常參加勞動以後，就時時想到，隊裏的每一個勞動果實，從種到收，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汗珠，得來不易，因而對集體財物更加愛惜了，對自己的生活作風也更加檢點了。大隊長應妙根過去常到吳淞鎮上去吃吃



玩玩，这两年来也改变了。这个大队的干部都很少上街，即使到公社所在地的镇上开会，也是一散会就赶着回来，参加生产。他们說，不参加劳动，一空下来就想上街，参加了劳动，就一心一意想搞生产，把队办好。党支部书记潘东才除了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之外，一到家里，拾水、烧火、洗衣服，缝缝补补，什么都干。在他的鼓励帮助下，他爱人虽有三个孩子拖累，每年也还做了三百多个劳动日。

大队干部克勤克俭，对生产队干部也是帮助。今年三月里，谭家宅生产队要造一间仓库和一个粪坑，打算买一些木料砖瓦，预算要花三百多元。在这里蹲点劳动的大队长应妙根知道了以后，就和干部、社员商量，一定要精打细算，注意节约，大家决定粪坑暂时不造，仓库也利用废料，因陋就简，自己动手修造。结果，修仓库只花了五十多元。社员们高兴极了，说应妙根会盘算，而应妙根却坦率地说：照过去的做法，这预算也许就批准了，如今经常劳动，盘算也就不同了，我们一亩田辛苦耕种一年，纯收入大约五十多元，这回一次要花三百多元，就等于六亩田一年的纯收入，这不盘算行吗？通过事实的教育，大家对勤俭办队也更加注意了。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进一步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干部下田劳动，社员都招呼他们同自己在一起干活，边劳动边谈心。他们在劳动中了解了社员的思想、生活情况，社员有什么需要，就主动地帮助社员解决。

有一回，潘东才在苏家宅生产队劳动，社员随便谈起，队里有座石桥坏了，过路人提心吊胆，很不方便。潘东才听到后，忙和队干部商量，很快就想办法把桥修好了。社员们知道了很感动，都说：“老潘真体贴社员。”

干部经常同社员一起劳动，也容易及时发现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生产中领导生产。去年有一次，潘东才在姚华浜生产队劳动时，发现男女社员之间的工分差距很大，如有个男社员，有一天竟得到了二十五个工分，而沈雪英婆媳三人却只得到了二十四工分，问题在哪里呢？潘东才同社员一起劳动，并且一起参加评工记分，才发现一是男劳力的底分偏高，二是一部分重活的定额偏高。问题找到了，他就发动干部、社员合理修订了劳动底分和劳动定额，解决了男女社员同工同酬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两年来，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在生产中领导生产，对全大队各生产队的农副业增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九六二年，全大队农副业的各项指标，除棉花因受灾减产之外，其他都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稻麦两熟亩产平均八百四十八斤，总产量超过原计划的百分之一点三；油菜平均亩产一百八十三斤，超过计划百分之七点七；蔬菜平均亩产七千八百斤，超过计划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其他生猪、羊、禽、兔等也都超额完成了任务。随着生产发展，社员收入也有了增加，一九六二年，全大队分配总额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九点三。



社員的好榜样，青年的帶路人

莫占林

“前有車，后有轍”，是北京市順义县張喜庄人民公社后渠河生产大队干部，在介紹他們参加劳动的意义时說的一句話。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杜永余和大队长張文治，从八年前組織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起，就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去年，党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二百七十天，大队长参加劳动二百七十八天。在他俩带动下，絕大多数干部在参加劳动中有力地領導了生产；絕大多数青年社員都踏着他們父兄的脚印，树立了“劳动光荣”、“以社为家”的思想；大队的集体經濟日益巩固，生产事业蒸蒸日上，人們的精神面貌也显得光彩焕发。

这个大队和所屬两个生产队的十七名干部，絕大多数原来都是貧雇农，他們当了干部后，一直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去年，他們平均每人劳动二百八十七天。党支部书记和其他主要干部，对于耕犁拉打、篩簸揚拿、提粮下种，样样农活都是行家。哪里缺人，他們就递补到哪里，哪里发生了問題，他們就奔向哪里。今年春寒未消的时候，水渠堤壩决了一个五尺多长的口子，眼看水就要把邻队的麦苗淹沒。在这个时候，队长張文治首先跳进水里，青年們也跟着跳下去，一个从

未經过風霜的独生子，也不由自主地脫去棉衣跳进水里。經過一番緊張激烈的战斗，决口的堤壩迅速被修复。去年有一百七十多亩玉米严重受澇，大家都认为沒有指望了。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干部怀着焦急的心情，同几个有經驗的老农一道，在現場观察研究，最后决定采取集中人力边耨地边追化肥的办法。几天以后，玉米果然复苏了，秋收时收了二万五千多斤。社員們說，这些玉米是“拾得来”的，要是干部不参加劳动，哪能及时發現和解决問題，这批玉米准扔了。

干部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常常开会，有时早晚还要抽時間到地头料理活茬。他們除了在和社員一起干活的时候按劳登記工分外，其他非生产性劳动一概不記工分。干部領取誤工補貼，最多也不能超过制度規定的天数。去年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只分別領取了七十天和四十二天的誤工補貼。全大队支出的干部誤工補貼，只占投工总数的百分之一点八一五。干部积极参加劳动的模范行为，給广大社員树立了榜样，博得了社員的信任和好評。許多社員說：“社、队干部和咱們一起劳动，咱們和干部就沒有隔膜”，“干部积极带头劳动，咱們都把心窝子掏出来干”，“干部說什



么，咱們都相信”。

对于干部要不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問題，在后渠河大队的干部中，曾經进行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有的說，干部领导生产主要是“操心”，即使不参加劳动，也能把生产领导好。支部书记认为，干部是群众的“样板”，如果干部动嘴不动手，就会失去社員的信任，不能搞好生产，事实证明也是这样。

第一生产队队长坚持在劳动中领导生产。他在收工以后，常常到庄稼地里查看活茬情况，晚上就同队干部一道研究部署第二天的生产。由于他对全队的每一种活茬情况，每一个社員的思想和劳动能力，都了如指掌，派起活来就能因人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每个劳动力的作用。最近，他抓住麦收前的間隙，抽出十三个最强的劳动力，到邻村帮助修建猪圈。留在队里的其他劳动力则分别担任玉米和白薯地锄草工作。八天以后，一齐动手收割小麦。由于計算周到，安排合理，这个生产队的生产搞得挺好。第二生产队队长“光說不练”，“只謀不干”，在社員們干活的时候，总是两手背在背后，哈着腰問社員：“你干得怎么样啦？”或者对社員說：“你干得对！对！对！”說完就照例倒背双手到生产队的場院看門睡觉去了。社員們一看到这位队长，都装着沒见到他一样。由于脱离了劳动，他对活茬的情况也不熟悉了，“謀”也不灵了。有一次，他看到第一生产队割糜黍，就想当然地叫一批青年社員也去收割糜黍，他們到地里一看，糜黍还没熟呢！大伙对这位队长就越看越不順眼了。由于这个生产队的生产安排得不完全得当，生产受到一定影响。这两个生产队的生产条件基本相

同，年終結算时，二队比一队少收粮食八千斤，一队的劳动日工值也比二队的高。今年改选队干部时，这个队长落选了。

会计是否也要同其他干部一样参加劳动，这个問題也有爭論。有的干部认为，会计只要把賬目記清楚，就算尽了責任，用不着参加劳动。有些干部不同意这种意見，他們认为，会计平时一天只有几笔賬，工作量既不大，就应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多一人劳动为集体多增加一份财富，队里还可以少補貼一点工分；他們还认为，生产队的会计，是劳动者的管家人，劳动者的管家人应该和劳动者一起劳动，而不应当学地主的“管賬先生”那样，当“甩手掌柜”。现在，大队和生产队的三个会计集中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有賬記賬，沒賬时一人值班，两人下地干活。去年两个生产队的会计都劳动了二百六十天左右。

爭論最激烈的是当干部吃亏不吃亏的問題。持有“干部吃亏論”的人认为，干部又做工作又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多劳应该多“得”，为什么不能多記工分？他們由此得出結論，当干部不如当社員，干部就是“吃亏”。

許多干部都不同意“吃亏”的說法。有的說：当干部的，只要一不躲懶二肯干，就不会少得工分，去年絕大多数干部所得的工分都不低于强劳动力，就是一个证明。有的說：当革命干部，做共产党员，为社員多做些事，多劳累些，这是应该的，怎么能說是“吃亏”呢？党支部書記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問題的症結。他說：到底是当干部吃亏，还是旧思想纏住了我們？咱們都是給地主、富农扛过活的，为什么不想一想，那时，咱們是怎样受人



家剥削？受人家欺侮的？现在好容易自己当家作主了，不好好掌握“印把子”，却说“当干部吃了亏”，难道这不是好了疮疤忘了痛？经过这场争论，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思想，才在绝大多数干部中树立起来。去年除会计外，其余十四名干部都分别劳动了二百七十天到三百四十一天。一支有战斗力的、能够和社员同呼吸、共命运的干部队伍形成了。

在这个大队的一百零二个劳动力中，有三十七个劳动力，是最近几年陆续参加农业生产的城乡知识青年。其中绝大多数青年都在干部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循着勤劳俭朴、热爱集体的道路成长起来了。

二十岁的刘文路，是去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农业生产行列的。开始时他想：整天同土疙瘩打交道，这有什么前途呢？因此，他在干活时不大讲究质量，追求高工分，看到困难的活，就趁早闪在一边。去年秋收时，大伙都以非常喜悦的心情，争着把装满粮食的粮袋从场院扛运到仓库里去，可是，在刘文路的眼睛里，这些沉甸甸的粮袋，却是一副又累又重的担子，他连忙赶到一些轻巧的活茬场所去了。

经过一段时期的劳动和观察，刘文路发现干部的劳动态度和他多么不同：老队长的腰部原来就有些毛病，在挑上劳动中又把腰扭了，众人都情不自禁地为这位老队长担忧。可是，老队长第二天又照旧在劳动。这件事情使刘文路受到深深的感动，他不禁为自己先前的行动而羞愧了。

现在，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干部，干部挑重活，他也抢着干重活。今年春初，看到干

部在泥濘不堪的渠旁挖泥修渠，他也卷起裤腿赶到泥沼里挖泥。黑夜，他紧跟在干部后边，推着三百斤重的运土车，从渠下奔向渠上。在这次修复渠道的工程中，他们的生产队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挖土的，但是在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上，却居上游。这使他第一次真正感到劳动的伟大和幸福。他现在已经安下心来，“以社为家”了。为了继承老农的经验，他自觉地积极学习他们的农业技艺。最近在参加谷子、高粱间苗的劳动中，老农在前面干，他紧紧在后面跟，开始不是质量不合格，就是速度跟不上；经过勤学苦练，他现在已熟练地掌握了这两种活，还初步学会了施肥、锄草和撒种等种植技术。

比刘文路大两岁的杜连来，六年前读完初级小学，就在本村参加农业生产。他是一个孤儿，解放前依靠要饭来养活自己和双目失明的母亲，解放后在政府救济下，家庭生活有了安排，自己也上了学。在他投入农业集体生产这个革命熔炉的第一天，党支部书记源源本本地把他家的一部悲惨的“家史”告诉他：他爸爸干起活来是个好样的，村子里谁都称赞，可是在旧社会，贫雇农没有给自己劳动的权利。他爸爸给地主、富农扛了一辈子的活，受尽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结局像所有的贫雇农一样悲惨，抛下妻儿，离开人世。支部书记对他說，现在咱们有了劳动的权利，党和政府又帮助咱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可要珍爱劳动呵！杜连来噙住眼泪，在一个本本上记下了支部书记的话，并且把这当做参加劳动生产的第一课。

可是，在他最初参加劳动的时候，实际的劳动生活，却向他提出种种问题：在一个



陰雨天里，隊里派出兩種活，一部分人栽白薯，一部分人挑水給白薯澆地，他的任務是挑水，從溝下挑到溝上，路滑難行。他瞧着泥濘的坡道正在躊躇的時候，黨支部書記和生產隊長正干在前頭，一度出現在這個青年人臉上的猶豫的神色立即消失了，他很好地完成了挑水的任務。又有一次，隊里的活茬很緊，他家里抹房、搭炕等活計也很急，是先公後私，還是先私後公呢？他到黨支部書記和隊長家里一瞧，發現支部書記家里的炕已拆了五、六天了，炕應該隨拆隨搭，可是支部書記一直沒時間干私活；隊長家里的豬圈沒墊土，他家的小孩正在費勁地向圈里扔泥上。他從這些活生生的事實中，受到了啟發。現在，他是全隊公認的突擊重活的能手，哪里有困難，哪里就有他在勞動。在粘滑的坡道上推車運土，他不用人拉繃，就推着三百斤重的土車向上猛沖。為了早日把糞肥送到地里，好騰出時間適時播種，他走在三十個青年社員的最前面，一天挑了一百二十挑糞。在他的帶動下，這些青年人把預計要三天才能運完的一百三十方糞一天就運完了。去年秋收時，他白天勞動，晚上受社員們的委托，在場院里連續住了四個多月，認真看守糧食、柴禾。他就是这样熱愛勞動，熱愛集体的。

二十三歲的杜蘭英，成長得更成熟一些。她也是在讀完初級小學後參加農業生產的。她在成長過程中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堅決跟着黨走，把黨支部書記和其他干部的模範行為當作自己的學習榜樣。她奮不顧身地勞動，和群眾打成一片，遇事堅持真理，維護群眾利益。每次評獎時，她的名字都列在

前茅。她擔任過婦女隊長，團支部書記，前年又被選為婦女大隊長，今年被批准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

她的體質不很健壯，可是在社員中，她却是大家公認的一個勞動最好的女標兵。她被婦女們選為隊長後，總是站在婦女們的前頭干活，並在活茬的質量和操作的速度上做出“樣板”。社員們休息的時候，她就趁空檢查活茬質量。在日常生產中，她處處關心群眾。王洲蘭體力較弱，龐富蘭有六個孩子，家務很重，她就給她們派靠近家邊的“碎活”。秋收以前，她安排婦女們趁空縫制棉衣，使她們在秋收時能夠集中力量參加秋收。去年鋤地時候，她發現女社員干活的效率比男社員低不了多少，活茬質量也不差，可是女社員勞動一天，要比男社員少記二、三個工分。女社員們對這種同工不同酬的不合理現象議論紛紛，很有意見。可是這個隊的有些干部認為，女社員的勞動能力弱，是“配角”，應該記低工分，不承認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她就將這件事提到大隊會議上討論，最後糾正了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按照男、女勞動力在各種農活中的綜合勞動效率，合理地規定男、女勞動力的標準日工分。社員們對新的記工辦法都很滿意。

有一天，她到縣里開會，按慣例由大隊給她記誤工賬，第一生產隊的記工員又在隊里給她記了工分，她翻開勞動手冊發現了這種情況後，立即讓記工員作了更正。她緊緊記住黨支部書記一直囑咐她的話：“當干部絕不能多吃多占隊里的勞動果實！”她在这方面對自己要求很嚴，常常起早帶晚為集体干零星活，也不記工分。她很少為私事誤工，到



公社卖猪、买用品，也都是利用中午歇晌的时候去办。她最近几年所得的劳动工分，比全队所有女社员都多。

刘文路、杜连来和杜兰英，在这个大队的知识青年中，代表着三种类型。近一两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十多名知识青年，像刘文路一样，已经安下心来，正在随着“轍”儿开步走；参加农业生产三年以上的十多个青年人，大都和杜连来的情况相同，树立了“以社为家”的思想，正在顺利地随“轍”前进；有十个青年人，和杜兰英相类似，他们分别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副队长、妇女队长等职务。

现在全大队的三十七名知识青年，有十

四人是共青团员，有五人受到大队的表扬和奖励。他们在党支部领导下，以团组织为核心，每月十日、二十日收工后集中学习一、二小时，冬闲时每周学习两次，有时讲团课，有时结合队里生产讲农业知识，有时则请党支部书记和其他老贫农，讲述本村贫雇农在旧社会中受压迫的历史。他们在劳动中，想到老辈的人差不多都受过地主的迫害，为了鞭策自己，总是学着干部的榜样，把轻些的活让给老辈的人干，而自己把重活承担下来。挑粪、黑夜澆水等，青年人都抢在前头干。老年人赞赏地说：“这真是守着什么人，学出什么人，什么样的人，教出什么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能一贯参加劳动？

万里云 潘用庭

福建省尤溪县团结人民公社大队干部，一贯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不仅形成了制度，而且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能够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几年来这个公社的生产稳步上升，获得丰产丰收，多种经济有很大的发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社员增加收入。由于各项工作成绩显著，全社五个大队都被评为县的模范大队。

团结人民公社五个大队的二十一个主要干部，从一九五六年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时候

起，就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几年来，平均每人每年参加集体劳动一百八十天，最多的在二百天以上；到了一九六二年，则达到二百二十八天，其中最多的三百四十三天，最少的也有一百零八天。生产队干部每人平均劳动天数达到三百一十八天。今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比去年还要好。

团结人民公社大队干部为什么能够一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呢？

首先由于他们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有较高的思想觉悟，有良好的劳动习惯。他们大部分是土地改革时期贫农出身的积极分



子或干部，亲身受过旧社会的苦，因此更体会到新社会的甜。解建大队党支部书记張世鎮說：“我們是土生土长，一貫靠劳动吃飯。解放前，劳动累得半死，还是沒吃沒穿的；今天在党的培养下，当了干部，怎能不积极工作、劳动生产？”光林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元策，从一九五九年以來一直在比較落后的生产队工作，同群众一起把这个生产队搞好了，就又带着老婆孩子搬到另一个生产队去落戶，参加生产劳动，改造落后队。这样，他接連搬了三次家，帮助三个比較落后的生产队改变了面貌。他說：“我家六口人，在旧社会吃野草、树叶，現在生活好，又叫咱当家，怎能离了劳动？”上源大队党支部书记林世浪，从一九五〇年当干部以來，一直是下队带鋤头，上山带土箕，到县、社开会还順便运物資。从一九五二年起，他一直是县、区、社的劳动模范，并出席过省的林业先进工作者會議。他常說：“我們是共产党的干部，不参加劳动像什么？”因結大队大队长蕭祥金，也是从土改后就当干部的。他劳动是个全把式，在劳动中也是淨搶重活干的。他說：“重活、髒活都是真功夫，干部带头才能够保证质量。”劳动对于这些貧农出身的干部确实是普普通通的事情。公社畜牧場配种員郑世英今年已經六十一岁了，还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劳动。他在一九四九年便参加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斗争。一九五六年他是乡治安主任。那时，社的畜牧場由于缺乏經驗，六头母猪和十多头小猪养不好，出于对社会主义集体事业的高度責任感，他自动要

求当飼养員。到畜牧場后，他精心細养，猪长得很好，从此他就轉入养猪这一行业。人民公社化后，他被調到公社畜牧場管种猪，經常赶着公猪到三十多个生产队去配种。去年劳动了三百多天，得了三千二百四十个工分。由于他积极工作和劳动，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被选为公社民政、調解委員。

团結人民公社的大队干部劳动好，和县委、公社党委認真貫徹党的政策，重視干部的思想教育是分不开的。

尤溪县委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就抓住城关区園溪乡党支部书记詹其燮的工作好、劳动好、思想好的事迹，广泛宣傳；号召全县区乡干部学习詹其燮。在詹其燮的影响下，原来劳动好的干部，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了；原来劳动不够好的干部，也受到了教育，改变了工作作风。人民公社化后，上級党委又一再号召干部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发揚艰苦朴素作风，和群众同甘共苦。后来，还具体規定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定額制度和严格的檢查評比制度。任务要求更加具体，干部思想更加明确，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走上了經常化、制度化，并逐步成为习惯。

群众的监督也是这个公社大队干部能够一貫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五六年办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干部領了固定工分補貼，加上工作繁忙，有些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少了。群众对这些不認真参加劳动的干部很有意見，批評他們說：“农不农，秀不秀的（意即不务正业），像个个什么样？”这类輿論对干部影响很大。前解建乡



党支部書記張德朝，有一段时间成天忙着开会，一个月劳动不上两三天，工作也沒做好，他領導的大通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桥头两个較好的生产組，生产反而比別人差。当时群众对他的批評很尖銳，同时县委又正在号召学习詹其燮的先进思想和先进工作方法，使他認識到过去的做法不对头，于是他下决心改变工作方法，認真和社員一起劳动，密切和群众的联系，逐漸地把生产組的落后状况改变过来。上源大队大队长刘連坤去年只参加集体劳动一百零八天，沒有完成劳动定額，年終評比时，社員就批評他这一条，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今年一至五月他的劳动天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現在这里形成这样一种風气，干部是否参加劳动是衡量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劳动好的受到群众贊揚，劳动不好的就受到群众的批評。团結人民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由于能够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社員相处，更加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許多群众心里有話，就主动找干部談，有問題，就主动找干部解决。到处可以看到干部关心社員、社員体貼干部的事例。社員对干部的体貼、帮助，实际上是对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和积极为群众工作的一种督促和鼓励。

县、公社以及大队本身工作制度的改进，也保证大队干部有时间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为了使干部能經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各大队很注意加强集体領導，发揚民主作風，发挥各种組織的作用。党支部書記主要抓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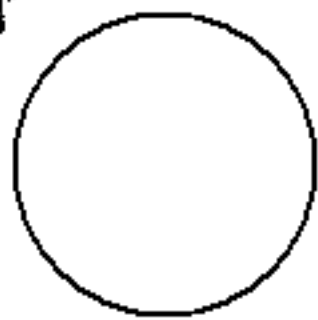
的政治思想工作，大队长管生产、生活等行政工作。支委会每月一次，紧急問題可以临时碰头。各大队都有生产、民政、調解、文教卫生、武装、治安等組織，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人做，有人管，使干部不致忙于各种事务，顾此失彼，妨碍生产。同时，他們又实行了干部全面完成劳动定額的制度。每个干部都到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并通过劳动生产解决生产队的問題，以推动其他生产队的工作。大队干部在哪个队工作，就在哪个队参加劳动和分配，同社員一样完成劳动定額，一样評工記分和实行奖賠，并和社員一起評比。此外，每一季度干部又自行評比一次。

在會議制度上，大队干部規定凡是能够在田头商量或个别商量解决的問題就不开会，能够在自然村开会解决的不集中到大队去开会，必要开的会在晚上开，并且在会前充分准备，尽量縮短會議时间。此外，还規定主要干部开碰头会的制度，以便及时处理急待解决的問題。这些制度，干部和群众都很欢迎。公社布置工作或下达指示，尽可能由委員分头去各队传达贯彻，尽量少开大队干部會議，个别商量能解决的問題，該誰来就通知誰来。去年公社召开的党支部書記、大队长會議，每月平均只有一次。县委也是如此，書記、常委、委員經常深入大队、生产队，大队一級干部會議也很少召开。县里发表报、要数字，一般只发到公社，并力求簡明和切合实际，以免下面干部陷入写材料、搞統計的事务之中。这些做法，都为大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望山下

碧野



在春風細雨中，我跟着中共湖北省南漳县委派駐前進生產大隊的工作組長老李，一同去四望山腳下。我們路過青泥灣，隔着蠻河，對岸就是四望山。青泥灣平坦遼闊，土地肥沃，攔河堰一道又一道，渠流縱橫，水田漠漠，是全县最富庶的地方。可是只有一河之隔，那四望山脚，却是历来穷僻荒涼的去处。

隔着蠻河遙望那烟雨濛濛的四望山，灰色的雨云纏繞山腰，蒼黑的山峰巍偉峻拔，高出群山之上。不論晴雨，不論从哪一个角度，都可以望見它，果真是名不虛傳的“四望”山。

“四望山是老游擊區，你要訪問的那個郭玉山，當年是個很出色的游擊隊員……”

老李的話，給腳下蠻河的嘩嘩水聲打

斷了。蠻河上，橫跨着一節一節顛悠悠的橋板。雨洗的橋板光溜溜，有點滑腳。蠻河水在橋底下掀起激浪，橋板一個勁的搖晃，使人眼花。

我們踏上河對岸的卵石灘，又穿行在柳林中，柳梢飄灑着水珠，處處傳來淙淙的泉流聲。心里產生一種春意正濃的美妙感覺。

“看來四望山下並不荒涼呀！”我怀着喜悅的心情說。

“這是近些年才改變過來的。”老李笑着說。

穿出柳林，眼前突然出現了一片片映照天光的水田。油黑的秧田里，撒滿金黃的谷種，一個戴着斗笠的孩子，手舞竹竿，正在斜風細雨中追趕着想偷吃秧田里的谷種的喜鵲。

“雨天里還在看守秧田，這孩子真負責！”我稱贊道。

“這都是郭玉山教導出來的！”老李驕傲地說。

在細雨濛濛中，我們順着一條滑滑溜溜的田間小路，來到前進大隊黨支部書記郭玉山同志的家門前。這是三間低矮的瓦房，牆上的土坯經過長年久月的風吹雨打，從屋檐到牆腳，布滿大大小小的裂縫。可是屋子周圍，却另有一番新氣象，栽種着柿子、桃、杏、核桃和石榴。這些帶着春雨的果樹，在微風中抖閃着綠光，顯得欣欣向榮。

郭玉山的妻子熱情地招呼我們。又讓坐，又燒茶。她說：“玉山下田干活去了。他是忙人，我也忙，連屋子都顧不上收拾。”



我注意到屋里的陈設非常簡單，但是堆滿尾角的鋤頭、鐵鍬、鏟頭等生產工具，却特別令人注目。

“我家的房子還是土改時候分的呢。”郭玉山的妻子一面往灶里添柴，一面說，“本來大隊撥給五千塊磚瓦，要給我修房子，可是玉山生來只有公沒有私，他說先給社員修，自己的不忙！”她像是在埋怨，又像是在夸耀。

“大嫂說的句句是實話。”老李對我說，“郭玉山十幾年來沒有忘記勞動人民的本色。他是大隊黨支部書記，又是公社黨委副書記、區委委員、縣人委委員、省人大代表，可是，連一件干部服也沒制過！”

“他呀，一個錢都攥得手心里冒汗！”她在灶間里帶着笑聲說。

“這倒要看在什麼事兒上了！”老李急忙分辯道，“老郭自己省吃儉用，可是對幫助有困難的社員很大方呀！就拿你家鄰居劉振昌來說吧，他害肺病，孩子又多，他家沒鹽，你家給；他家沒柴，你家送。我說這話不假吧？”

“這些事都是真的。玉山常常這樣對我說：階級兄弟有困難，我們大伙應當幫忙嘛！”郭大嫂在灶間里感動地說，“就說我家燒的這些柴吧，也是玉山趁着月亮地上山砍來的。他白天領着社員們干活，晚上還給家里種菜園、上山挑柴。他已經是四十開外的人了，還經常挑一百七八十斤重的担子，也够難為他的了！”

她的話剛剛落音，忽然有一個渾身被雨

打濕、頭纏白布巾的中年漢子走進門來。我猜他是郭玉山，急忙站起來。可是老李却給我介紹說，他是前進大隊黨支部副書記雷大銀。

“我只頂得上半個郭玉山。”雷大銀也發覺我把他認錯了，就直爽地笑着對我說。說話間，他朝屋角看了一眼說，“老郭准是去二隊了。”

我很詫異，為什麼雷大銀看了一眼屋角，就知道郭玉山去了二隊呢？老李是個細心人，他看出我的疑惑，便向我解釋：現在正是耙稻田壓青肥的季節，二隊生產比較落后，雷大銀看見沒有了釘耙，就猜着郭玉山到二隊勞動去了。

雷大銀是個火燒火燎的角色。這幾天他正害病呆在家里，是那個看守秧田的孩子告訴他郭家來了客人，才趕來看看。一見面他就憋不住地跟我談起了郭玉山。

郭玉山從來沒有忘記在舊社會給地主種應工田的苦處。所謂應工田，就是地主只給二畝壞地耕種，年頭到年尾，地主一聲喊，就要趕去給他家干活。耕種二畝地，不是誤了農時，就是草長得比庄稼還高。在舊社會受盡飢寒的人，他就更會感覺到新社會的溫暖。郭玉山體會“勞動”這兩個字，不但是給社會主義創造財富，同時是給無產階級鞏固政權。因此，他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勞動。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他當公社副書記兼大隊支部書記的時候，就經常跟社員一起勞動。去年五月間，郭玉山回大隊，正趕上割麥子、上山割草瀝肥。他碰見啥活



干啥活。按襄阳地委规定，大队干部每年劳动一百二十天就行了。可是他去年从六月到九月就干了七百八十五个工分。

接着，雷大银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去年十月间种冬麦，郭玉山带领着十五个人取沟，各取一块田。定额二十五丈长、一尺宽、一尺八寸深，为十二个工分。郭玉山取了三亩半，质量好，每天只合五个工分。可是社员陶亭礼、杨如祥两个贪多图快，取的毛毛草草，没有达到质量要求。郭玉山讲究实干，平时话少，可是遇见了这种事，话就多了。他立即指着他俩取的沟问道：“看你们取的这种沟，能不能排积水？能不能增产？”陶亭礼和杨如祥都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却说：“要是像你那样取沟，工分低了，可划不来！”郭玉山说：“定额高了，尽可以向队里提意见修改，可是你们干活为了大伙增产呢，还是为了自己挣工分？”陶亭礼和杨如祥一听，连忙拿起工具返了工，还彼此相互警告说：“以后再不敢弄虚作假了，老郭一锹也不放过的！”

“群众爱的就是郭玉山对人和气对事严！”老李在旁补充说。

“要是没有老郭领头带路，我们这四望山脚下眼前就不会有这一派好风光！”雷大银接过郭大嫂递过的大碗温茶，喝了一口，咂了咂嘴巴说：“以往，春天育秧，还要到青泥湾去找谷种；可是现在，青泥湾的姑娘们也争着来我们四望山脚下对亲了！”

雷大银这最后一句话，逗得郭玉山的妻子笑了。

“说真的，玉山当了十几年干部，别说大队里的社员，就是连我这个床头灶脚的人，也是处处佩服他！”郭玉山的妻子说得很动情。

“瞧瞧，你不怕在客人面前落个夸夫之嫌？”雷大银很有风趣地看了她一眼。

她果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只说了句：“我还要去喂猪呢，你们不要走，等一会我回来给你们做饭。”就一阵风似的跑出门去了。

雷大银从门里望着她去远了的背影说：

“她也是一个女将，把队里的猪喂得膘肥肉厚，每年出的肥，比哪一个猪场都多！”

“你们这里田肥水足，生产可赶上了青泥湾？”我问道。

老李立即把话接了过去。

“说起肥源，除了牛栏猪圈以外，这里还有一座四望山，山上的茅草、花楸树叶，漚成绿肥，每年就有几百万斤；说起水源，这几年开渠引水，也不比青泥湾差，四望山有仙女洞、狮子岩这两股大泉呢。”

“我们四望山的泉水流进五里长的盘山渠，流上高高的银子岗！”雷大银像唱歌似的说。

他俩一拉一唱，说得我动了心。我要求上四望山去看一看。

我们走出门来，抬头一看，天空只飘着雨丝，头顶上露出一片耀眼的天光，这预兆着春晴。四望山上的雨云消散了，雨洗后的巍峨山峰，屹立在我們面前。

我们走出村子，一条溪流迎面奔来。溪流上有一座磨房和一座弹花机篷寮。在哗哗



的水声中夹杂着水磨隆隆和水力弹花机叭叭。溪对岸，出现了一个像镜面一样光洁的打谷场，场边是新修的仓库。

“好繁荣的气象！”我不由得赞叹起来。

“这都是郭下山想的点子。大队里有了水磨磨面，有了水力弹花机弹棉花，社员们就不用跑远道去公社磨面弹花了。打谷场和仓库连在一起，边打场边入仓，又节省了多少劳动力呵。”老李细致地一一向我介绍。

“你瞧，那山上有个梳妆台呢！”雷大银忽然兴冲冲地对我说。

我顺着他的手指向四望山上望去。在越来越明朗的天光下，果真有一座奇怪的石崖，腿细头粗，孤零零地竖立在山腰里。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一座削尖的孤峰压上了一块大岩石，像一根玉柱顶着一面大银盘。狂风吹不垮，暴雨打不至。

老李含笑地告诉我：民间传说有个仙女住在四望山的仙女洞，那上面就是她的梳妆台。乌云是她的头发，太阳月亮是她的耳璫，星星是她的项珠，彩霞是她的披肩，山花是她的容颜。这是过去住在这个穷地方的人们对自己家乡的幻想和安慰。但这个幻想，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他边说我边听，跟着雷大银上了山坡。忽然老李停住脚步，回身把手一扬，提高了声音说：

“你看，这周围有多少堰塘，这许许多多堰塘不正是明镜，它们给天光云彩照影梳妆吗？”

我吃惊这个年轻的工作组长天赋一种诗

人的气质，既细致又深情。在他的手势下，我回头一看，映着天光的无数堰塘正像开启的明镜，倒影着流云、青山、绿树和梯田。

于是我怀着一种肃穆的心情跟上他们走进一条山沟。山沟里流着一条溪水，浪花在水石上奔腾、飞溅。越往里走，山沟越窄，草木越深，只见一线天。山径时隐时现，时断时续，一会儿在溪流这边，一会儿在溪流那边，我们卷起裤脚，时不时要趟过急流才能前进。

“瞧，这就是仙女洞！”峭壁前回响起雷大银宏亮的喊声。

我跟着老李拨开杂树乱草走前去一看，果真山崖下出现了一个大石洞。洞很深，黑黝黝的；洞口有几间房子大，可以坐上百十个人。天光从两山之间投落到沟底，可以看见有一股泉水从洞底下渗出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水清沙白。近看泉水不大，可是流出十步远，就变成了嘩嘩的小溪。

“真没有想到这股泉水这么大！”我的声音在悬崖峭壁前回响。

“原来泉眼小得多，是老郭领着几个党员，点着灯笼火把进仙女洞，经过十天八夜才把它疏通了的！”雷大银的声音在崖前嗡嗡地响。

我坐在水石上，把脚伸进冰凉的泉流里，呆呆地看着崖洞下清澈的泉源，大有心旷神怡的感觉。要不是雷大银震得山崖嗡嗡响的大嗓门在催我走，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清静的仙女洞呢。

我们顺着原路回到山沟口子上，然后绕



着弯弯曲曲五里长的盘山渠往前走。这时，雨云已经散尽，天空显得碧蓝碧蓝的。天晴日暖，春风拂面。沿着四望山脚的盘山渠和注满了渠水的一个个堰塘，在微风下泛起涟漪。

“挖这五里长的盘山渠和这大大小小的堰塘，工程可不小呵。”我说。

“这条盘山渠和许许多多堰塘，哪一处没有老郭的脚印！”雷大银挥臂指点着远近的堰塘说，“那是泥鳅沟，那是龙窝，那是黑鱼冲，原来的死水塘都变成了活水堰。山那边，还有个狮子岩大泉，狮子岩的泉水引上了银子岗！”

泉水顺着渠道在山岗上滚滚地流动，水声淙淙。我欢欢喜喜地跟着渠水跑了一阵，然后冲下山岗，朝着一片长得特别油绿的麦地跑去。

老李告诉我，这儿是郭玉山的品种试验田。田里的庄稼好像比别处长的都要早些。麦子已经扬花，棉花已经出苗，稻秧已经翠绿。一块连着一块，全竖有木牌，十分整齐。每一块，土质一样，面积相等。在麦子试验田里，栽种的是阿尔巴尼亚的阿勃和阿伏、印度的24号、川农51号、南大2419号等麦种；在棉花试验田里，播种的是岱字15号、彭泽4号、石短5号、红岱2343号等棉种；在水稻试验田里，栽培的是大秣、中秣、339、南巡1号、背籽糯、三颗寸等稻种。

“哎呀，天南地北的种籽都有哪，这试验田真是把全世界都包进去啦！”我惊叹起来。

“老郭说这是农业科学呵，分厘也差不

得。他常说，从这几块试验田里，我们要眼看全国，也当真要看看世界，看看哪一种作物产量高，是适合在我们四望山脚下播种的。”老李用一种敬佩的口吻对我说。

这当儿，雷大银忽然一抬手说：“你们瞧，谁来了！”

我抬起头，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庄稼人，扛着钉耙从田间小路走过来。他剃光头，穿着对襟上衣，肩膀和肘子上都补着补丁；下身穿的裤子裤腿特别大，看样子是便于卷高了下田干活的。

“老郭，我们正找你！”老李朝那个人喊了一声。

我不禁一阵惊喜。啊，他就是我要访问的郭玉山！

郭玉山笑嘻嘻地朝我们这边走来。我仔细地端详着他。他那被风吹雨淋日晒的脸孔，像铁铸的一般黑；又浓又黑又长的双眉，蕴藏着聪明和智慧；他的善良的眼光，显得又忠诚又和蔼。

一种敬佩和爱戴的感情升上我的心头。郭玉山克勤克俭，热爱劳动、热爱集体，有远大理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农村干部呵！

正在我凝然深思的时候，工作组组长老李给我和已经走到跟前的郭玉山作介绍。郭玉山拉住了我的手。我感到他的大手又有劲又暖热。

太阳高照，晴空万里，雨后四望山显得格外青苍，水流飘曳闪光，田野翠绿，我们祖国的春光多么明媚呵！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王樂生 杜加星 項紹棠

浙江省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自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林、牧、副、渔等各项生产得到全面发展。全社六千三百多亩田地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从一九五七年的六百二十四斤增长到一九六二年的八百五十八斤，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目前，全社生猪的存栏数达二千二百三十头，每户平均一点二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八。由于生产发展，全社的总收入从一九五七年的三十七万元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六十三万七千元；社员的分配收入，从一九五七年的二十七万八千元增加到一九六二年的四十八万元，分别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二。这个公社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五年中，除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一千零七十万一千斤粮食征购任务以外，还多向国家出售了七十二万五千斤商品粮食。公社化以来，在国家的支援下，各生产队还依靠集体的积累，联合兴建了一个小型水力发电站，全社初步实现了排灌机电化，加工机械化。

城西人民公社生产年年好，生活步步高，这是广大社员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总路线的偉大紅旗，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結

果。同时，也和全社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在生产劳动中起带头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城西公社的干部都是不脱离生产的。公社党委的全体委员（包括党委正副书记、公社正副社长），都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不领国家工资，不吃国家粮食，以普通社员的身份，同社员一起劳动，同社员一起评工记分，同社员一本账分配。他们因公误工减少收入的部分，由公社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给以一定数量的补贴工分，这些工分的报酬，从社办企业中开支。一九六二年，这个公社的党委委员，除了一个分管公社工业企业的以外，其他八个干部，实做工分七千一百分，平均每人参加劳动一百一十一天。今年头四个半月，公社八个主要干部，除一个生病的以外，实做总工分三千二百零一分，平均每人参加劳动五十天。这个公社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也很好，绝大多数人的实做工分都达到了同等劳动力的水平。

干部参加劳动的好处很多

这个公社的干部，五年来坚持参加集体劳动的结果，证明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好处



很多。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便于接受社员的监督，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避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个公社的干部，由于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保持了劳动者的本色。他们衣着朴素，手脚勤快，成天戴着箬帽，赤着双脚，和社员一起挑大粪、干重活；有事情，田头当会场，坐下来就商量，没有一点“架子”。社员们对干部也很亲切，很信任，他们很少称呼干部为书记、社长的，像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老年社员都叫他阿龙，青年社员都叫他阿龙哥。今年五十九岁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严傅兴，大家都叫他“老严伯”。公社的干部，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改选，廖锡龙、严傅兴、苏德华等同志，五年来都是连选连任。平时，群众敢于监督干部，干部也能够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把群众的监督比作是“擦脸”、“洗澡”。干部有些缺点，也能够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及时得到克服。去年年底，沙岗大队几个社员结婚时摆酒请客，在这个大队工作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严傅兴没有劝阻，也给他们送礼，和生产队干部一起参加吃喜酒。许多社员对这一点有意见，说：“干部带头送礼吃喜酒，这是提倡浪费！”老严知道了，就主动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讨。社员很满意。在公社干部的影响下，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能接受群众的监督。沙岗大队党支部书记潘顺弟，出身贫苦农民家庭，解放后，劳动很积极，但是，在当了大队干部以后，渐渐脱离了劳动，讲究吃穿。后来，经过公社

党委和群众的批评与教育，他觉悟过来，重新脱下鞋袜，和社员一起劳动。近几年来，他每年所做的劳动工分，都超过了同等劳动力的水平。这里的干部说：“和社员一道参加劳动，脸上的灰尘，身上的脏东西，大伙都看得一清二楚，马上帮着擦洗，使干部永远干净。”

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便于在生产中进行科学实验，经过刻苦钻研，把自己锻炼成为又红又专的好干部。城西公社的干部懂得，农村干部要搞好工作，就必须熟悉生产，只有过了这一关，既会讲，又会做，才会得到群众的信任。因此他们几年来一直坚持和老农、技术员一起种试验田，进行各种农业科学实验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公社化初期，这个公社在发展农业生产中所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低产田的数量太多，妨碍大面积高产。当时全社六千三百多亩田地中，粮食亩产量在五百斤以下的低产田就有三千多亩。为了突破这个生产薄弱环节，他们总结了过去几年来改造低产田的经验，分别从清沙土、青紫粘土等七八种不同土壤的低产田中，挑出几丘作为试验田，和老农、社员一起，积极进行改造低产田的试验。当时水塔大队第四生产队有两亩半水田，每年“立夏”插秧，“小满”退黄，肥料施得越多，稻苗死得越快，虽经多年改造，产量还是很低，群众都叫它做“顽固田”。有的社员说：“这丘田如果能改好，水塔队的田都会变成千斤田！”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就挑它作为试验田。经过两年的努力，他终于在这



丘“頑固田”中摸索到一套降低地下水位和改良重酸土壤的經驗。現在，廖錫龍同志已經初步摸熟了全社各種土壤的性能和改良這些土壤的不同措施。公社社長徐金火，通過試驗，選育出幾種適合於當地不同土壤性能的水稻良種。其他幾個公社幹部也在試驗中找到改造各種低產田的途徑。一九五九年秋收的時候，由公社幹部管理的七丘低產田，畝產量都超過了七百斤。這個喜訊傳開以後，全社很快就掀起了改造低產田的熱潮，什麼“死板田”、“蓑衣田”、“爛泥田”，都迅速開始改變面貌。到去年，全社三千多畝低產田中，已有百分之九十的面積，畝產量超過七百斤的水平。

這個公社提高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開辟新的肥源，增施肥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廖錫龍同志從一九五九年開始，就堅持做綠萍（水生綠肥）越冬越夏的試驗。經過四年的努力，終於在去年取得了成功的經驗，為當地晚稻找到了新的肥源，對全社水稻的增產有着重大的作用。

這個公社的各級幹部，由於勤學苦練，鑽研技術，許多同志都成為生產能手，成為縣的、或者專區的、省的農業勞動模範，有的同志還成為在某一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的“土專家”。如公社黨委書記廖錫龍，就被當地群眾譽為“土壤專家”；公社社長徐金火，被省農業科學院栽培育種研究所聘請為特約研究員。這樣，就使我們黨的基層組織，放在積極勞動的先進分子手裡。

幹部堅持參加勞動，又是最直接地接近

群眾、了解群眾思想情況、對群眾進行思想工作的一種最方便的方法。這裡有一個例子，很能夠說明這一點。沙崗大隊有一個社員叫吳鏡柱，思想落後，開起會來，說的蠻好聽，一到田里就說怪話。生產隊要治蟲，他就故意說，這是天意，蟲是天上放下來，人治不了；生產隊要拔稗草，他就故意說，農民的老祖宗是吃稗草的，稗草是谷娘，是消滅不了的；生產隊搞評工記分，他又說，天天像“三堂會審”，太麻煩。公社黨委副書記嚴傳興在這個大隊勞動，吳鏡柱的這些怪話，他很快就了解了。老嚴一方面用事實向社員說明，吳鏡柱的有些講法完全是迷信，根本沒有這回事；另一方面，又積極幫助吳鏡柱提高認識。吳鏡柱在舊社會也是個受過苦的人，三、四個兄弟為了逃避國民黨抓壯丁，東跑西散，最後把五、六畝田也賣掉了；解放後，他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生活才逐漸好起來。嚴傳興同志主動找他個別談話，啟發他回憶對比舊社會給他帶來的痛苦，新社會給他帶來的好處，同時又發動社員幫助他，終於使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轉變了過來。解決了吳鏡柱的思想問題，也教育了其他社員，提高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像這樣的事例，在這個公社是很多的。這個公社的幹部在集體勞動中，注意了解社員思想情況，幫助社員解決思想問題，因而就更好地團結了群眾，社員有話就向幹部說，有事就找幹部商量。有的社員說，“幹部和我們一起勞動，田頭漫談，日長月久，把我們的心思都摸透了。”



怎样教育和帮助干部坚持劳动

城西公社的干部，在参加集体劳动、领导生产的过程中，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但是，他们以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解决了思想问题，坚持了参加生产劳动的好作风。

从一九五三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这里的干部就在党的不断教导之下，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同社员一道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九五七年冬天，经过整党整风，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又实行了一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那个时候起，这里的党组织，就经常教育党员、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并且把劳动好坏作为评比干部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每次进行干部评比工作的时候，首先是检查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表扬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干部，树立榜样，号召大家学先进，同时，也适当批评劳动差的干部，帮助他们改正缺点。这对鼓励干部参加劳动起了很大作用。几年来，由于坚持了这种评比的制度，在干部中逐渐树立了热爱劳动的好风气，“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成了社会的舆论；劳动的好坏被群众看作是鉴别干部的重要标准，谁劳动好，谁就得到社员的拥护。许多干部反映，在城西公社当干部，劳动差，是很难为情的。

城西公社的干部在参加劳动生产过程中，主要解决了以下两个思想问题。

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城西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老干部，绝大部分当选为公社干部。一九五九年春天，一部分干部的思想波动起来了，产生了脱离生产好还是不脱离生产好的问题。有些干部说：“别的公社干部都是脱离生产的，我们为什么不向上级要求脱产呢？”“一个公社等于过去的的一个乡，乡里也有五、六个干部，我们不脱离生产，工作怎么搞得好呢？”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同志向大家解释说：“我们是本地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从小劳动惯了，还是不脱离生产好。”可是，有些同志思想还是不通，说：“你是省劳动模范，一脱离生产，怕当不成模范嘛！”有的甚至说：“我们是假干部，吃力不讨好。”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公社党委组织全体干部讨论：到底是“真干部”还是“假干部”？脱离生产好还是坚持参加生产好？不少同志认为党和群众这样信任我们，把城西公社的工作担子完全交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一千五百多户人家的生产、生活大事，怎么能说是假干部呢？通过回忆对比，多数干部认识到自己是穷苦人出身，在旧社会没有半点地位和权利，现在翻身当了干部，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那种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才是真干部、好干部。不少同志在提高认识以后，自觉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思想。他们说，解放军、土改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劳动，我们为什么反而不想劳动呢？不少干部还列举了自己家庭在办社以后年年增加收入的事实，说明



只要积极参加集体生产，把集体经济办好，就会同社员一样地增加收入。有些党员、干部还说，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社员生活，即使需要自己吃点亏，这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来说，也算不了什么。经过讨论，绝大部分干部都说：“要知此中情，先为此中人，只有不脱离生产，多参加集体劳动，讲话群众愿意听，工作才好做，想想付付，还是不脱离生产好。”这时，个别干部思想还不通，于是，公社党委又把这个问题拿去同社员商量，让大家再听听群众的意见。社员说：“干部不脱离生产，领导生产更实际。”有的社员还说：“脱离生产，参加劳动少了，就容易脱离实际，你们的思想就可能变坏，还是和我们一起劳动好。”这时，上级党委也支持多数干部和社员的意见，赞成他们坚持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和社员同命运、共呼吸。这样，思想终于统一起来了，最后大家决定都不脱离生产。

一九六〇年春天，人民公社的各项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干部肩上的担子加重了，做好工作和参加生产发生了一定的矛盾。有些干部的思想又波动起来了，认为这个矛盾是解决不了的。有的还埋怨说：“我们又要做好工作，又要参加生产，辛苦死了。”这时候，有些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又少了，有的干部浮在上面，工作不深入了。群众反映：这些干部是“锄头圈”（指干部背着锄头到田里转一圈就走了）。公社党委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又组织干部讨论了廖锡龙同志的经

验。廖锡龙同志是县、省的劳动模范，又是县、省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为什么他参加社会活动比本社其他干部多，参加生产的时间也比本社的其他干部多呢？主要是因为他思想上重视这个问题，抓住一切空隙时间参加劳动，从外面开会回来，也是一路上检查生产，了解情况，一到家就立即下田干活。平时他把工作带到生产中去，到哪里去工作，就在哪里参加生产，边劳动，边了解情况，发现了问题及时解决，并且先在自己参加生产的地方做出样子，用典型示范的方法，指导全面工作。党委分配给他负责的社务工作，他常常是安排在中午或晚上休息的时间去办，尽量不妨碍参加劳动的时间。廖锡龙同志的模范行动，对公社的其他干部帮助很大，他们说：“阿龙公务多、会议多，劳动这样好，跟他学，工作与生产的矛盾不怕解决不了。”

同时，公社党委还研究和改进了工作方法，注意精简会议，有准备地开好会议，并且尽可能把会议搬到田头、地边去开，联系实际，就地解决，做到劳动、工作两不误。

本刊启事

本刊1963年第1—12期半年总目录，原应在第12期刊出，因篇幅限制，改在第24期上刊登。



他是庄稼人

周維敷 任洁民

在湖北省浠水县望城人民公社十月生产大队，社员们谈起公社党委书记兼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饶兴礼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来，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老饶真是个庄稼人！”

一 闲不住的双手

一九五二年春天，饶兴礼串连了十二户贫苦农民，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湖北省第一批创办的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已经成为望城人民公社一个拥有四百零四户社员的十月生产大队。在党的领导下，饶兴礼同社员一起长期奋斗，把十月生产大队办成了一个思想上先进、经济上富裕、组织上巩固的生产大队，成为湖北省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一面旗帜。

饶兴礼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几次见到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从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并被选为中共浠水县委委员。去年一年，他曾经担任中共浠水县十月区区委书记的职务。饶兴礼当了干部以后，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还是个庄稼人。

饶兴礼调去当区委书记的时候，十月生产大队有的社员曾经惋惜地说：“老饶当了

区委书记，怕再难得跟他一起说说笑笑做活啦！”

后来，社员们放心了：“老饶忘不了我们。”

去年七月——正是大忙时节，社员们历来都要在这时候打几个夜工，抢割早稻，抢插二季稻。一天傍晚，区委会的会议刚散，区里通讯员给大家买来晚上的戏票。是好戏，外地刚到县城来的汉剧团演出，大家都想去看。饶兴礼说：“我有点事，要到十月生产大队去，不看戏了。”大家不知道他有什么大事，硬拖他去看戏。他才说：“社员们打夜工割谷、插秧，我想去帮一下。”听他这一说，别人都难为情了，一个一个退了戏票，急急忙忙到各自“蹲点”的生产队去。

又有一回，也在夜里，饶兴礼正在区里开会，忽然下起倾盆大雨。他想到十月生产大队低处的谷田有被淹没的危险，便在散会以后冒雨赶到这个大队，几乎把整个大队转了一圈，然后又赶到第七生产队，带着二十几个社员跑到“脚盆底”（地名），顶着大雨疏通渠道。

饶兴礼就是这么一个人。社员们说他“不做活，手痒痒的不好过”。他起得早，睡得迟，一天到晚脚不停，手不闲。他走到哪里，拣起活来就干，而且专门干重活、脏活和难活。比如，往田里送粪，有挑粪的，也有撒粪的，他一定挑粪；起塘泥，有上泥的，



有挑泥的，他一定挑泥。這一帶地方有個習慣，由於白天太陽毒，耕整二季稻田大都在夜晚，兩個人使一頭牛，分上下兩班換着干。有些社員愛在上半夜做，做了好乘天涼睡覺；饒興禮當然知道下半夜做活苦，但是，他却總是搶着做下半夜的活。

如今的庄稼活複雜，不光是會動犁、耙、抄子就行。生產大隊的大半活兒，饒興禮碰着了能揀起來就干。這不簡單！這是用硬功夫一樣一樣學來的。他在水產隊學會了挖藕，在機務隊學會了開抽水機、開拖拉機。他原本不會挖藕，有時要跟水產隊的幹部、社員商量個急事，就覺得為難，非把人家找上岸來不可。饒興禮想，這哪行，像個“當官的”。於是，他下定決心，跟着社員下湖挖藕。挖藕是冬天干的活，一雙腳踩在爛泥里，褲腳卷到大腿以上，腳腿凍得又紅又腫。有人對饒興禮說：“你有事找社員商量，就在晚上去水產隊開個會，何必吃那麼大的苦呢？”饒興禮認真回答道：“社員們能吃這個苦，我為什麼吃不得？再說，同社員們一起做活，人多嘴多，可以談多少事情，又談得親熱。”

饒興禮職務多，工作忙，來十月生產大隊參觀訪問的人月月都有，但是，他却始終堅持參加勞動。他參加勞動的時間都是擠出來的。五月上旬，我們訪問饒興禮。這十天中，區里、公社都開了會，外面還有几處來參觀訪問的。區里上午散會，下午他就在十月生產大隊插秧，一邊勞動，一邊向大隊幹部講了區里會議的精神；晚上又到別處傳達。外面參觀訪問的人來了，他抽區里和公社開會的休息時間，給他們作報告，介紹情況。一天，太陽快落土的時候，他陪一個參觀團參觀完畢，看天還沒有黑，就下田幫社員扯

秧，扯了八十多個秧，才摸黑去開會。

二 又勞動，又領導

十一年來，饒興禮始終如一地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在暴風雨的夜里，他和社員一起守護秧苗；在烈日灼人的夏天，他和社員一起車水抗旱。饒興禮在勞動中，了解了人，也了解了生產情況。他既參加了生產勞動，又在勞動中領導了生產。

饒興禮對開會很有研究。他說，“上級開會，制訂方針政策，一個大會管年把，幾個月；下面具體事情多，要開會，天天有會開，那就不用勞動了。”他的辦法，一個是能在勞動中解決的問題，就不開會；一個是在勞動中了解情況，發現問題，醞釀辦法，然後開個短會解決問題。所以，饒興禮參加勞動時，愛到人多的地方去做活，愛到有困難的地方去做活，愛和社員一道進行技術革新試驗。有問題要解決的地方，多半有他在那裡勞動。有一次，他發現第五生產隊的插秧進度比別隊慢，他去了，不說要開會，先下田幫社員插秧，看見十七、八個人擠在一丘田里，做不出活來。他一邊插秧，一邊和五隊隊長商量解決辦法，建議隊長開個短會，把勞動力分了組。本來五隊還要三天才能插完秧，結果一天多就插完了。

前年抗旱的時候，機務隊的一些青年抽水機手，常常深更半夜一個人在湖邊上、野場里工作，天氣熱，蚊蟲咬，工作很辛苦。饒興禮親自在夜里去代替抽水機手抽水，或者給他們做伴。他在實際勞動中体会到抽水機手在夜間工作的辛苦。他建議大隊和機務隊給野外工作的抽水機手準備竹床、蚊香和夜餐。解決這些問題以後，抽水機手感到集



体的关怀和温暖，工作安心，精神振奋，提高了工作效率。

去年，抢插二季稻的时候，饶兴礼看到多数地方插秧进度比十月生产大队快一些，就有些焦急，对十月生产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有些埋怨情绪。当他回到十月生产大队，同社员们一起送肥、整田、插秧以后，他才发现社员们上工早、收工晚，不歇气地在干，插秧进度比别人慢一点，是因为社员想更多增产，下肥多、整田细，多用了工。这样，虽然进度慢一点，但是，没有误季节，而且质量好，对增产有利。这些事，不亲自下手干，看不清，瞎批评，就会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十月生产大队的干部研究出许多评工记分的方法，不同的农活，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劳动。这些办法为多数社员所拥护。有一次，饶兴礼在第七生产队运肥，运肥是按每一车的数量计算工分的。他发现，有个别社员利用这个方法取巧，每逢要过秤的时候，他们将车装得满满的，不过秤的时候，装上大半车就跑。贫农社员、共青团员傅运金很不满意，故意对取巧的社员喊：“这一趟称我的，给我的车少装一些！”这事引起了饶兴礼的注意。其他贫农社员告诉他说：“有的人就是光顾自己，投机取巧的事还有哩！”饶兴礼在集体劳动中了解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熟悉了各种各样的人。在一次党支部大会上，他举出许多事例，说明改进经营管理要走阶级路线，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听过他讲话的人都說，饶兴礼是十月生产大队最熟悉情况、最能了解阶级动向的人。

十月生产大队在生产上进行了许多改革。饶兴礼领导生产改革的本事是从劳动中学来的。

饶兴礼在劳动中一面动手，一面动脑。有一年春天，他在一块田里劳动，被一个现象吸引住了：在同一块田里，种同样品种的“胜利油菜”，施同样多的肥料，耕作方法也一样，可是，靠塘边的油菜和不靠塘边的油菜，一边长得好，一边长得不好。是什么原因呢？从此，他就经常到油菜田劳动，注意观察、比较，后来找到了原因。原来“胜利油菜”喜欢肥土好墒，靠塘的一边，土质好，墒情好，长得就好；不靠塘的一边，土质坏，墒情差，就长得不好。当年冬播，第五生产队土质好、水源好，要求多种“胜利油菜”，他就支持；第八生产队土质不好，水源差，有的干部也要多种“胜利油菜”，他就建议他们还是多种原来的“油菜白”品种。因地制宜安排的结果，第二年，油菜都获得了丰收。

饶兴礼在劳动中把种好试验田当作重要任务。他在山冲里土质最坏的瓮坛冲做试验。这个冲，“天晴三天就旱，下雨三天就淹”。有人对他说：“老饶！你是全国劳动模范，何不在大路边选一块好田做试验！”饶兴礼说：“种试验田不是为了好看。”饶兴礼在种试验田的劳动中，找到了瓮坛冲产量不高的原因，把它改造成了丰产冲。现在，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千年落后瓮坛冲，一跃变为丰产冲”。社员们说：“我们的老饶，到底是个庄稼人，一点雨（语），一点湿（实），有他领导，不愁不丰产。”

三 “亲不亲，看劳动”

“社员看干部，亲不亲，看劳动”。这是饶兴礼在十月生产大队第六生产队“蹲点”一年，和社员同劳动得到的体会。



六隊社員孟會元的一席話，對饒興禮這個體會作了很好的解釋。他說：

“我們六隊合併到十月大隊來的時間晚些。開始，老饒到我們隊來的也不多。社員雖說知道他好，不過還不知心，還不能掏心挖肝和他見面。

“後來，老饒三天兩日往我們隊跑，一來就脫鞋下田做活，一邊做活，一邊談心。開始，大家跟他談話總是一本正經的，開口一個‘饒書記’，閉口一個‘饒書記’，生怕走了調。日子久了，覺得老饒跟自己家里人一樣，就漸漸同他親了。眾人也改了口，我們三、四十歲的人叫他‘老饒’，歲數再長一點的就叫他的名字，小青年叫他‘饒哥’，同他談話隨隨便便，心裏話往外倒。

“有一回事，大家最感動。那是前年的事。有一天，我們全隊社員都到五里路外的‘腳盆底’去插秧，我也去了。到天快黑時，大家才回來。我們孟家灣前有口塘，塘下有丘大田，我們回來一看，吃了一驚，沒有下雨，怎麼塘里水漲了，再一看，塘下那丘大田的水却淺了。過後，大家才曉得是老饒做的事。原來前兩天下了雨，那丘田裝滿了水。我們忙着去插秧，沒來得及車水灌塘。恰好這天上午，老饒在外面開會回來，看到這一大田水，往下放，流到河里，太可惜了。他在隊里找人，一個勞動力也沒有找到，老饒轉身就到大隊機務隊，找到一位抽水機手，兩人把一部小抽水機抬來了。他留下那人擺弄機器，一個人又去扛抽水機的管子。一節管子怕有幾十斤，來回兩、三里路，他跑一次又一次，六、七節管子，一個人扛來了。兩個人把架子架好，接上管子，噹噹噹！抽起水來，把田里水起到塘里。老饒黑汗水流，幫我們做了一天

活，我們還不知道哩！老饒還幫助隊里解決了很多問題。有一回隊里缺秧，社員們急得只是埋怨隊長。老饒不做聲，跑東隊，串西隊，幫我們借秧，挑回一担又一担。

“老饒做活舍己，做得狠。割谷，他總搶着挑草頭，社員們休息了，他還要搶着挑一担。我們怕他累了，派人到路上去接，他總不肯讓肩。老饒這樣舍己干活，大家都看在眼里，潤在心裏，同他越來越親。開始我們怕他狠做，是為了照顧他，心裏想，當干部的，坐着開會開慣了，哪能像我們一樣做！現在，大家更怕他累着了，勸他休息。想法卻不一樣，老饒為大家辦事，這樣舍己，累壞了怎麼辦！

“人熟是個寶。老饒和大家一起干活，把我們的脾氣都摸着了。我在隊里負責看水、管秧。有一個時候，心裏不痛快，老饒一眼就看出來了。做活時，他和我在一起扯家常。我也把心裏話掏給他。我說：‘這管水的快活官我不想當了。’我為什麼說這話？因為有人說閑話，說我這份差事輕鬆。我這個人，苦活做得，吃點虧也不怕，就是聽不得冤枉話。老饒指點我，他說：‘為大家辦事，肚子要大點，好話壞話都要裝得下。’他還說，多數人說我好，叫我是‘水利局’，夸我是‘秧保管’。聽他這一說，像喝了糖茶似的，心裏甜滋滋。

“老饒把我當知心人，我哪能把他當外人，有些裝在肚里一兩年的話也倒出來了。以前，隊里有少數人做活耍滑，多要工分，他們有好多花樣，我看在眼里，記在心裏，但是，不想提，因為牽扯到好些人，都是兄弟叔伯的。現在，我才把真情實況一五一十地跟老饒讲了。我原來還不知道這事有好大，老饒說我反映了一個大問題。他說，原來大



队还以为劳动定额订得合理，照着办就行，不知道有这么多漏洞。”

孟会元谈了很多，千言万语都是说老饒跟社員是一家人。他有一句话可以作总结，他说：“老饒是庄稼人，泥里生，土里长，同社員一条根。”

四 “劳动是根本”

饒兴礼确实是泥里生、土里长的人。

这个在旧社会当雇工、种佃田的贫苦农民，就是靠自己的汗水活下来的。七岁的饒兴礼开始捏牛鞭放牛的时候，父亲就对他說：“穷人家，不做，就没有吃的。”他做活没有让大人劳神，十五、六岁就学会了庄稼人的十八般武艺。不过，这个勤劳的小伙子，当时却有力无处下啊！地主陈寿之的一块除了草以外什么也不长的荒地，被饒兴礼一家老小用汗水浇开。那年春天，眼看着烏綠綠的小麦、黃閃閃的油菜就要到手，地主却来夺佃了。腊月二十九，地主又来逼债，把牛牵走了。汗水变成了泪水，劳动果实喂饱了地主仇人。

土地改革以后，乡农会主席饒兴礼，带着自己的小兄弟，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扬眉吐气地劳动。他们起早贪黑，使出一身劲来干。这时候，党决定调饒兴礼到区里工作。一年以后，饒兴礼又回到了望城乡。他按照党的指示，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从此，饒兴礼将自己的劳动和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

一天，合作社主任饒兴礼、会计郭卿祿同社員們一起挑塘泥。两人都是从区里回来的，差不多一年没有做重活了。社員們穿着

单褂挑泥巴，郭卿祿压得肩膀痛，不得不穿着棉袄挑。饒兴礼也觉得挑得吃力。社員們看見了，有人說：“怎么样，干这活儿，比在上面开会吃苦些吧！”众人听了发笑，饒兴礼心里却吃了一惊。他发現在劳动上同社員有了一段距离。他暗自对郭卿祿說：“劳动，这是对我们干部的考驗啊！过不了这一关，合作社就办不好。”

从这时起，饒兴礼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参加不参加劳动，不是一个人的小事，而是关系到党和群众关系的大事。脱离劳动就会脱离群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光动嘴巴不行，要拿起鋤头来干。

饒兴礼对十月生产大队的干部讲过一个“戴了紗帽歪了嘴”的故事。这是本区的新鋪公社天鵝大队一个干部的事情。这个干部原本也是穷苦人出身，工作很好。可是，当了模范，升了“官”，就慢慢地变了。阶级敌人恭維他，說：“天鵝大队办得好，住在天鵝大队，人的影子都长些。”又說：“你为大家操劳，把个大队办得这么好，你少做一点，哪个还說什么事！”这些甜言蜜語，他听得舒舒服服，真不劳动了。不劳动，什么“病”都可能生。阶级敌人送来的东西他伸手就接，同自己共过患难的貧农兄弟的要求他不聞不問，一心只图个人安逸。饒兴礼說：“我们不劳动，就会忘本，就会忘記过去的穷兄弟，就会在阶级斗争中站不稳脚跟。”

饒兴礼在劳动中和自己的阶级兄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觉得这些和自己一样做过雇工、种过佃田的乡亲们，今天的日子过得还不算好，自己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在吃、穿、用、住上都不应该鬧特殊。貧农



社員万登安是饒兴礼在旧社会一起挑脚、卖工的患难朋友，又是屋脊連屋脊的老邻居。有些同志考虑到工作方便，曾經劝饒兴礼从山坳里搬到比較方便的地方去，另做新屋。这时，万登安生活还很困难，不能和饒兴礼一起搬家。饒兴礼想到了这一点，不願让万

登安一家孤零零地留在山坳里，就立刻打消了搬家的念头。万登安知道了这件事，感动地說：“老饒一心向着我們啊！”

在我們訪問饒兴礼的十天中，他的一句話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劳动是根本。”

十三年手不离鋤



張健 任山

在贛西边境的湘东河畔，有一个工作很出色的生产大队——萍乡市湘东人民公社新村生产大队。这个大队在解放初期，水稻平均亩产五百多斤，一九五七年以后，亩产稳定在一千斤左右；一九六二年战胜了四次洪水、两次害虫的侵襲，亩产仍达到一千零六十一斤。社員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集体經濟越办越巩固。新村大队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好？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干部艰苦奋斗，带头劳动，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带动群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湘东公社社长兼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彭光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彭光賢是一个朴实淳厚、平易近人的普通劳动者。他經常穿着对襟的粗布衣服，卷起裤腿，打着赤脚，双手长着厚厚的茧子。一九五〇年，彭光賢担任乡人民政府的生产委員时，去区里开会，总要带着粪桶，开完会，就順便把粪挑回来。一九五三年成立初級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里派了两个社員长期

住在萍乡市联络大粪的事。有一次，天剛蒙蒙亮，彭光賢就来找他們。他們惊奇地問：“社长，你不是来开劳模会的嗎？”彭光賢挑起粪桶說：“早晨沒有事，走，一块打粪去！”这两个社員听了非常感动，和他一道去打粪。挑完两担粪，彭光賢才回到会场吃早飯。時間过去十年了，現在，彭光賢虽然已經担任了省人民代表、中共萍乡市委委員、市人民代表、湘东公社社长等重要职务，但是人們还經常看到他和社員一起挑着大粪在萍乡市街道上走过。去年，新村大队組織一批人去排上开荒，因为缺少肥料，彭光賢带着十多个大队、生产队干部到萍乡市去挑大粪。以后几天，一百多个社員也陸續参加了挑粪的行列。从萍乡市到排上，有六十五华里；但是，社員看見社长挑着一百来斤的重担子，和大家有說有笑地走在前头，就不觉得苦了。这年春天，他們把二百多担大粪从萍乡市挑到了排上；秋天，这片貧瘠的土地，亩产稻谷五百多斤，比排上一般土地的



产量多了近一倍。

彭光賢能够一贯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一方面由于他出身贫苦，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同时，党的不断教育，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深远意义。

多年以来，湘东人民公社党委在公社和大队干部中建立了评比制度，以干部参加劳动好、联系群众好作为评比的一项主要内容。同时，还经常组织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历次关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这使彭光賢懂得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是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是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一起革命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他说：“原来我认为参加劳动，是自己的本分，经过党的教育，我才看得更高更远。”

有一年夏天，省里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负责同志来新村大队检查工作，和社员一起割禾。彭光賢看到他割禾的桩步、手势，很像行家，心里感到惊奇。这位同志告诉他，自己年轻时也是种田的，打过十年长工。并且语重心长地对彭光賢说：现在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作了主人；但是，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相比，还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永不脱离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彭光賢从这些话里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彭光賢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和期望。他事事听党的话，按照党的指示和要求去做，不讲特殊。他虽然兼职多，又是拿国家工资的脱产干部，每年出外参加社会活动的時間有一百二十天以上，还要处理公社、大队的工作；但是他坚决执行党的指示，想各种办法

挤时间参加劳动。每逢公社开会，他一早在队里劳动，吃过早饭才赶去，下午散会后，天没有断黑，又到田里干一阵；市委开会，本来头天上午可以搭火车去，而他往往是第二天起早，步行二十五华里赶去萍乡市按时出席会议；去省里开会，他总是搭晚车回来，在火车上过夜，第二天照常参加劳动。他在家的时候，早出工，晚休工，中午不休息，更是常事。社员说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新村大队由于田少人多，田间农活不紧，一个强劳动力每年也只能做二百五十个劳动日。可是，彭光賢自从一九五八年脱产以后，每年做的劳动日，总在一百五十个左右。

彭光賢从八岁起跟父亲学种田，有丰富的种田经验。当干部以后，他不仅积极参加集体劳动，而且还在生产中不断地进行科学试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一九五一年，他响应党提出的爱国丰产的号召，选择了七分田搞丰产试验。由于推广了各种农业新技术，平均亩产稻谷一千二百三十斤，比邻近一般田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多，获得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但是，彭光賢并不满足小面积高产的成绩，他带领群众积极钻研农业生产技术，寻找大面积高产的门路。他对每一项农业新技术，总是亲自动手，反复试验，不成功决不罢休。

新村这个地方，过去一向是清明浸种的。浸种晚，早稻插得晚，也收获晚，所以过去年年种间作稻，影响增产。彭光賢想：浸种的时间能不能适当提早呢？一九五二年春天，他从报纸上看到介绍湖南醴陵县浦口镇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呈桂的水稻丰产经验，谈到了“春社”浸种，他就亲自到李呈桂那里取



“經”。李呈桂告訴他，这一带每年在“春社”前后，有五天到十天是晴天，气温、水温也适宜浸种、播种。彭光賢和互助組員商量，大家认为这里离浦口只有五十华里，中間沒有大山，气候条件大致相同，决定試驗“春社”浸种。从这年开始，他們就反复地进行着“春社”浸种的試驗。每年，到了浸种、播种季节，彭光賢总是把全副精力放在上面，人家說他是“廢寢忘餐，心不离秧”。他白天帮助生产队看种催芽，晚上又每隔两小时去檢查一次浸种的情况。种谷下了田，不分白天黑夜，他走遍每一块秧田。秧田水滿了，就亲自放水；缺水了，就和社員一起車水。这样，十二年来，除了一九五三年因为气候不正常烂了一些种谷外，其余十一年都沒有烂种、烂秧。經過长期試驗，他們才摸清了当地气候变化的規律。浸种時間适当提早，早稻插秧和收割的时间也相应地提早。从一九五四年开始，他們逐步推行間作改連作，現在已經全面实现了水稻連作化，这就为大面积高产創造了有利条件。

“一切經過試驗”，“做出样子給群众看”，彭光賢运用这种方法来領導生产。十多年来，他凭着这股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亲自带头，和群众一起总结和推广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措施，促进了水稻大面积平衡高产。因此他被省科学部門聘請为农业科学特約研究員。新村大队的社員說：“彭光賢領導我們搞生产，实实在在，不讲空話，不瞎指揮，有样子，看得見，叫人信服，照他的样做不会錯。”

彭光賢不但自己带头劳动，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的两个年紀較大的儿女和他

爱人邓春英都是模范社員。今年春天，有些年青妇女穿着鞋出工，到田塍上脫鞋，嘻嘻哈哈打鬧一陣，耽誤了生产時間。一天早上，彭光賢发现自己的二女儿彭菊英也穿鞋出工，馬上叫住她：“你穿着鞋怎么下田呢？”菊英毫不在乎地回答：“到田塍上再脫唄！”彭光賢严肃地說：“菊英呀，种田人哪有穿着鞋下田的！你祖宗三代是种田的，你是共青团員，处处要在群众中起好影响呵！”女儿接受了父亲的批評，以后总是赤脚下田。别的年輕妇女也慢慢改变了这种不好的习惯。許多父母教子女，丈夫教妻子，向彭光賢一家学习。

彭光賢和他的一家，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用勤劳的双手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群众中起了良好的影响。新村大队解放前不是农业区，离萍乡煤矿很近，大部分人靠推煤、卖苦力为生，沒有农业劳动习惯。然而，現在的新村大队，男女老少都安心在家搞农业生产。这是社会風气的一个很大的轉变。去年以来，全大队有三十多个中学生和大学生回乡参加劳动。他們以彭光賢为榜样，安心务农。黎連生从省水利电力学院回乡，开始父母有些想不通。黎連生說，参加农业劳动最光荣，彭光賢担任那样多职务，工作那样忙，都坚持劳动呀！去年夏收夏种时，他的脚背上生了一个疮毒，痛得很厉害，队长要他在家休养。他想起彭光賢在劳动生产上处处带头，克服了种种困难，就渾身有了力量，用布扎紧伤口，又下田了。如今在新村大队，不論农忙还是农闲，村无闲人，一片繁忙景象。外地来参观的人，不是从新村大队的地理环境，而是从广大社員参加集体劳动所表现的蓬勃干劲，感觉到这里是真正的农业区了。



昔阳县四級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偉大范例

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

山西省昔阳县的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和县四級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领导生产，已經形成一种風尚。

正确的思想，指导正确的行动。积极参加劳动，基于对劳动的正确認識。昔阳县沾尚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常委）李千周說得好：“咱們农村干部，最要紧的是劳动。干部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就是和群众一起革命。社員从地里回来半腿泥，干部坐在那里鞋底还是白白的，怎么能让社員信任！干部脱离了群众，还怎么执行党的政策，帶領群众革命！”昔阳县广大干部正是由于把参加劳动当成自己的本分，看作是保持革命者的本色的重要条件，所以，能够自觉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长年坚持不懈。一九五九年以来，全县干部参加劳动一年比一年多，補貼工分一年比一年少。一九六二年，全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兩級干部，实做劳

动日平均每人增加到二百七十三个；補貼工平均每人减少到五十个，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点八。一九六二年，全县四百零四个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平均每人实做二百二十个劳动日，最多的做到三百三十个。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挤零時間工作，用整工夫劳动，已經成为一种風气。干部見了面，常常互相問：“你們咋劳动？做多少工啦？”大寨公社大寨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县委后补委員）、山西省著名劳动模范陈永貴，在任何情况下都沒有放松过劳动。一九五八年以来，他每年都做三百个上下的劳动日。今年三月，有三个县、市組織干部到大寨生产大队参观了三天。陈永貴除了忙于接待工作外，还起早貪黑地完成了生产队包給他的生产任务。第三天，参观者走后，天已过午，下起雨来，陈永貴怕完不成包干任务，就跑到地里去劳动，和两个伙伴一直頂着雨干到天黑。在陈永貴的带动下，大寨生产大队的干部，普遍养成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习惯。去年，全大队本来規定給七个人以補貼，实际上只有三个人接受了補貼。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不仅早出晚归，挤出時間劳动，而且拣重活干，搶脏活做。大寨生产大队，一九六一年春季鋤麦田时，有二亩地包工后，有些社員嫌草多难鋤，陈永貴就带头去干。夏季追肥时，肥料不足，陈永貴主張挖厕所。部分社員怕脏怕热不願干，陈永貴就帶着几个党员去挖。社員們看到党支部书记这样做，也就跟着干起来了。大寨公社井沟生产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宋艾



良也是这样，挖茅鏟、担挑、鋤刨地边等髒活重活，他都是带头干。每年从他肩上担到地里的肥料，和从地里担回的庄稼，不下五万斤。

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級干部，一面千方百计地多做劳动日，一面尽可能地少要補貼工。这种积极劳动、不計報酬的共产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貴的。陈永貴說：“党教导我們，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員，是人民的长工，就是要比群众辛苦些。如果当了农村基层干部，就不参加劳动，那不成了人民的老爷！”一九六二年，陈永貴做了二百九十个劳动日，公社原来确定給他的補貼工是九十個，分配时，他主动提出减少到三十個，最后，經過群众討論决定，他才接受了四十五個。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是昔阳县規模較大的一个生产大队。一九六二年春天，社員大会討論决定，給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十五个干部補貼一千零八十个工，占預計总投工数的百分之一點四。到年終，由于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平均每人实做了三百一十七个劳动日。分配时，人人要求减少補貼，最后，实际補貼了六百个工，占总投工数的百分之零點七五。

县、公社两級领导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給基层干部作出了榜样。县委书记、常委和县长等领导干部下乡，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劳动，工作做到队、做到地，已經成为习惯。县委常委王富元，日常工作很忙，但是，他經常在同劳动中做工作。一九五九年以來，他每年平均参加四、五十天劳动。沾尚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是脫产干部

参加劳动的一面光辉旗帜。四十八岁的李千周，粪筐經常不离肩。他一出办公室就挎起粪筐，到了地里，把粪筐一摆，就和社員一起干起活来。从一九五九年担任沾尚公社党委书记以來，他已經挎烂了两只粪筐。他每年总要拾一百四、五十担粪，做一百四、五十个劳动日。社員們都亲切地称他是“集体的好长工”、“社員的貼心人”。基层干部反映：县、公社干部那么忙，下乡还挤时间劳动，咱不劳动像話嗎？

昔阳县規定：机关于部每人每年都要有六个月的時間深入基层。到基层以后，半天劳动，半天工作。一九六二年，县級机关下乡的干部，平均每人在生产队做了六十二个劳动日。全县的公社干部平均每人做了八十二个劳动日。沾尚公社的干部平均每人做了一百三十九个劳动日。

各系統的基层干部，也都是劳动好手。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的妇联主任焦明眼、治安主任李义小等，到县里住党校、到公社开会誤了工，不仅都能补上，而且超額完成队里規定的基本劳动日。焦明眼为了赶工，每天晚上把第二天吃的干粮蒸好，或者早晨就把中午飯做好，以免耽誤劳动時間。刀把口公社丁峪生产大队妇联主任邢根文，积极帶領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九六二年，她直接领导的第四生产队，二十五个妇女中，有二十个完成或超額完成了基本劳动日，七个妇联委員的实做工都超过了基本劳动日。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會計参加劳动的問題。有人說，會計工作太忙，就是要坐在房子里写



写算算，下地劳动办不到。昔阳县的经验却不是这样。原小寨生产大队会计（现任大队长）张卯土，社员称他是“劳动会计”。他当会计多年，一直坚持劳动。他带出来的会计，和他一样，也都是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分子。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会计兼第四生产队会计刘根元，去年的定工劳动是一百个，实做劳动日达到二百二十一个。巴州公社二十四大队会计，一九六二年一至十一月份，平均每人实做劳动日一百八十六个。

在干部的影响和教育下，干部的家屬和年轻一代也都热爱劳动，把参加农业生产当作一项光荣任务。一九六〇年以来，县和公社干部的家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县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赵福义的爱人、共产党员王秋林，今年四十六岁了，带了五个十一岁以下的孩子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由于劳动好，当选为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刘官印的女儿刘拉良，初中毕业以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带头实干，被评为劳动模范。在一九五九年的全县大评比中，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屬，被评为夫妻劳动标兵、父子劳动模范的有五百四十对。

昔阳县的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热情，进一步发扬了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过去积极的，现在更积极了；过去落后的，现在转变了。沾尚公社的社员们，过去不习惯于清早下地劳动。李千周到了这个公社以后，启明星一出山，他就挎着粪筐到各村转，

带动和督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早下地；干部下地了，社员也就跟着出工了。沾尚生产大队社员张喜贵，过去不爱劳动，去年却做了二百八十多个劳动日。有人问他现在为什么劳动这样好，他回答说：“党支部书记还担茅粪、看羊，同社员一起干，咱再不好好劳动，面子上下不去，心里也过不去。”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社员程千成，前几年不好好劳动，老婆常常和他吵闹。近两年，程千成劳动积极了，每年收入三百多元，一九六二年做了三百二十多个劳动日。生活富裕了，家庭也和睦了。有的社员对他說：“千成越活越年轻啦！”他說：“干部們还没明没夜地劳动哩，咱不好好劳动，怎能对得起干部，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妇女們参加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的妇女，经常下地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很多妇女已经能够做担粪、掏茅、赶牲口等重活和技术活了。总之，劳动光荣，不劳动耻辱，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舆论。群众选干部，先看劳动好不好。青年男女找对象，都挑劳动好的。

昔阳县的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对生产的领导。干部和社员在共同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社员把干部当作知心人，无话不说，无事不谈，这就使得干部在生产指挥上做到眼明心亮，扎实可靠。社员們說：“干部参加劳动，能听到，能看到，能說到，能做到，生产还能搞不好！”李千周白天很少呆在办公室，到生产队也很少要表



报。可是，全公社的生产进度如何，哪个队有什么問題，他往往知道得最早最具体。他了解的情况，大都是在同社員一起劳动中得来的。社員把自己的心里話告訴他，他帮助社員解决問題。有一次，李千周上山，碰到羊工張原小，他就帮着放起羊来。張原小毫无顾忌地向他反映，吉家峪生产大队远处的地不如村边的地耕得好。李千周經過进一步了解，发现这还不是个别現象。他便馬上采取措施，解决这个問題。几天以后，全公社的一些耕得不好的地都变了样。李千周說得好：“和群众同劳动、同商量，既能摸透人的脾气，又能摸透自然的脾气，这是领导好生产的两个重要条件。”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的干部，由于坚持和社員一同劳动，对全队哪块地的土质如何，哪块地省工或費工，哪种活重哪种活輕，都了如指掌。因此，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基本上做到了因地制宜，劳动定額百分之九十以上做到了准确合理。洪水公社洪水生产大队大队长李玉崗，在参加劳动中了解到，七队两道沟二十多亩好地的玉菱，一亩只安了一千三百多窝，补种也来不及了。他就和几个老农商量，采取了隔窝留双株的补救办法，一亩留了两千多株，使生产免遭損失。

干部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中洒下了自己的汗水，就更加爱惜集体劳动的成果，成为精打細算的好管家人。城关公社东关生产大队的每一項开支，干部都同社員反复商量，再三研究，能緩办的不急办，能自制的不自制，旧的能用就不买新的，能用劳动力換的就不用錢买。因此，每年的生产費开支

从来沒有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管理費开支沒有超过百分之零点四。大寨公社大寨生产大队的干部們，在和社員同劳动中，深深懂得每一斤粮食都是一滴滴流到土里的汗珠换来的，因此，为队里办事，用粮用錢，总是精打細算，不浪費一斤粮，不乱花一文錢。一九五九年生产丰收，社員的生活富裕了，公积金增加了，有的社員要求修个戏台。干部們一計算，单就需要的劳动日來說，就可以整修二百多亩地，当年就能多收六千斤粮食。陈永貴給社員算了这笔賬，說服社員不要修戏台。社員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不修了。大队的办公室，直到現在还設在两孔旧窑洞里。

昔阳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所以形成一种社会風尚，主要原因是县委认真貫徹了党中央的指示，大抓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問題，从思想工作上和組織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反复深入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县委在全体干部中，广泛进行了党的政策教育、劳动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要求干部牢固地树立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在教育中，除了领导干部做出榜样，带头参加劳动外，还采取了层层树立标兵的办法，用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的經驗教育广大干部。县委把李千周和陈永貴当作全县的旗帜，广泛宣传他們在参加劳动中领导生产的經驗，并且把陈永貴的事迹和經驗編印成教材，发給各級党的組織，組織干部学习。县里还举办了大寨公



社大寨生产大队干部模范事迹展览会，先后組織六千多人（次）到大寨生产大队参观訪問。县和公社召开基层干部會議，經常介紹先进人物的經驗，或者請他們作报告。干部們都拿陈永貴当“鏡子”，对照檢查自己，提高認識，改进作風。在这个基础上，全县广泛地开展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竞赛的运动，有效地激励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东冶头公社开展竞赛以后，全社三十五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九六二年实做劳动日都达到二百五十个以上。

县委还通过各种會議和开办訓練班，教育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真正的人民勤务員。使干部懂得，要工作好，首先必須劳动好，不参加劳动，就必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使自己逐漸失去階級本色。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同志，經常檢查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及时进行个别教育，并且把劳动好作为选拔和考核、鉴定干部的重要条件。几年来，共青团县委、县妇联、县人民武装部，遵循县委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减少補貼工的指示，通过本系統的會議和訓練工作，对所屬干部反复、深入地进行了革命傳統教育和劳动教育。这些系統的基层干部，除民兵干部根据省委規定給予少量補貼外，团委和妇联干部都沒有要補貼。白羊峪公社南横山生产大队团支部書記乔桃善，經過几年的教育，階級觉悟越来越高，劳动和工作更加积极，他白天参加劳动，黑夜帶領青年义务巡田。今年，他当了民校教

員，大队提出給他補貼十五个工，他坚决拒絕了，并說：“老一輩人給我們打下天下，我們才过上幸福生活。我們要努力学习老前輩的革命精神，前輩能流血牺牲，我們少要几个補貼算什么！”

自上而下改进领导作風和工作方法，严格控制會議表报，为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創造条件。昔阳县委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以来，會議次数大大减少。能下去传达的事情不召开會議传达，能分片召开的会不集中到县里开，能在农闲时开的会不在农忙时开。一九六二年，县委只召开过一次为时七天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會議。县里还严格控制了各系統的會議。公社党委召开两天以上的生产队干部會議，要經過县委批准。党、政、团各系統的會議，一九五九年开了二十四次，一九六二年只开过四次。几年来，表报也大大减少。县級机关表报，除县人民委员会統計科按上級規定統計外，其他单位未經县委批准，一律不得下发。直接发到农村的表报，一九五九年是一百四十五件，一九六二年减少到六十四件。各公社也作了相应的規定，不輕易召开會議，不乱发表报，不准生产大队随便耽誤生产队干部白天的時間，工作到队、到地。沽尚公社規定，公社干部早晨学习，上午劳动，下午办公；白天不打电话找生产队干部；除按时統計干部参加劳动的時間、作物种植面积和农、林、牧等产品的产量外，不經批准不得向生产队要数字。对生产队干部也作了必要的規定。执行这些規定后，公社干部說：“上下都按規定办事，工作



主动，不忙不乱。”生产队干部說：“减少了許多麻煩，能集中力量領導生产，干部說話腰杆硬了。”沾尚公社干部除秘书和統計員外，平均每人每月有二十天以上的時間深入到生产队帮助工作。

随着县、公社領導作風的轉变，生产大队干部的作風也有了很大的轉变。井沟生产大队，根据居住分散的特点，在六个生产队設了四个联络点，有事由党支部书记到各点商議，大大减少了會議誤工。大队五个主要干部，除党支部书记外，都兼任生产队的队长，加强了生产队領導，又减少了補貼工。日常工作，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建立了“五一”碰头制，每五天中用一个晚上研究一次工作。会計建立了“五一”办公制，五天中四天劳动，一天集中办公。这样，就使干部逐漸养成了珍惜劳动時間、注意安排工作的习惯。一九六二年，安坪生产大队干部实行了集体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后，参加劳动的时间，比过去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东关、南庄等生产大队推行了干部輪流值班制，解决了参加劳动和处理日常事务的矛盾。

認真贯彻执行各項制度，保证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昔阳县坚持实行了“定工劳动，定額補貼”的制度。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县委就根据队規模的大小，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劳动工和补

貼工作了規定，大多数队执行得較好。为了彻底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在一九六一年秋收分配结束后，县委又进一步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兩級干部明确提出了“定工劳动，定額補貼，多做不减，少做不补”的政策，并且采取了层层控制，合理分配（縮小補貼范围，集中使用補貼工，把有限的補貼工用于誤工最多的人），自报公議，一次定死的办法。具体要求：百戶以下的大队，補貼工不超过百分之二；一百戶至二百戶的大队，補貼工不超过百分之一点五；二百戶以上的大队，補貼工不超过百分之一。受補貼人員和補貼多少工，由社員大会或社員代表大会討論決定，报公社批准。对主动不要補貼的人，实行实誤实記。

为了使社員和干部在劳动中能够相互監督，还把生产大队干部在半年或一年內，基本固定到一个生产队，編入作业組，同社員一样分配活計，一样評工記分，在劳动数量和质量上同样接受檢查驗收，承担生产責任。为了使“定工劳动，定額補貼”制度切实兌現，还实行了檢查評比制度。規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实做劳动日，和社員一样按月进行公布，并上报公社，以公社为单位，每季进行一次評比，分別給予表揚奖励或批評。这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把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永远坚持下去

——鞍山地区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

中共鞍山市委委员会

辽宁省鞍山地区(包括鞍山市所属辽阳、海城两县和辽阳市)几年来组织农村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领导生产,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今春以来,由于学习了山西省昔阳县农村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干部参加劳动的自觉性更高了。由于干部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的干劲更足了,农村工作更扎实了。

今年鞍山地区农村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去年比较起来,出现了以下几个新特点:

一、抓得早,落得实。去年,在三月间才普遍抓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工作。今年,许多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于年初就在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和总结去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每个干部的具体条件,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落实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计划,定出按月按季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动手早的海城县王石和辽阳县柳条寨等人民公社,在去年十二月间就把干部补贴工分指标落实到队到人。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许多社、

队干部一般都能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劳动计划,有的还一再突破和修订原来的劳动计划指标。

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更加普遍。去年干部参加劳动,海城县好些,辽阳县差些,鞍山市郊区和辽阳市郊区更差些。现在,不仅海城县农村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劲头很大,而且,辽阳县农村干部的劲头也比较大,鞍山市郊区和辽阳市郊区的干部也都普遍行动起来。过去,县级领导机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较少,公社一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不够普遍。今年,不但县委书记、县长和公社的党委书记、社长等领导干部和其他干部,都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且公社的文书、会计、广播员,也都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不但农业部门的干部,而且农村供销社、信贷社、医务所等单位的干部,也都结合自己的业务,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并在劳动中听取群众意见,改进了工作。

三、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工作和劳动结合得更好了。今年干部参加生产,一般



都比較有計劃、有目的，到哪里去工作，就到哪里去劳动。許多地方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还有重点地到后进队和問題比較多的队去参加劳动，帮助解决困难問題。如海城县牛庄人民公社第二生产大队第五生产队，距离公社和大队很远，生产和工作都比較差。今年由于公社和大队干部长期住在那里劳动，帮助建立领导核心，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从而使今年的各項生产一直领先，不仅大田生产搞得很好，而且开展了多种經營，社員的干劲越来越大。牛庄人民公社干部通过参加生产，了解情况，联系群众，还解决了生产上的一些关键問題。如去年春耕时，农活集中，劳动很紧张，由于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带动全体社員积极努力完成了春耕任务。去年秋收后，公社干部与生产队干部和群众经过研究，提早整地打耢子，今年有百分之九十五的耕地在清明前土地翻浆时打了耢。这样，既可防虫害、防旱和防涝，使土地得到休閑，又可避免农活过于集中。这个公社的干部在参加劳动中，还发现了各生产队都有大片的低产田，主要是盐碱地和一部分过远的插花地。他們不但加强了各生产队耕种低产田的领导，而且帮助他们出主意，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造了盐碱地一千一百亩，其中重碱地有二百亩。所有这些問題，都是干部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中发现，并和群众在一起研究解决的。

四、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比以前完备了。今年县、社、大队三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人人有計劃，有指标，

而且人人有劳动手册，同社員一样評工記分，普遍实行月检查、季評比、年終总结，并張榜公布，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內容之一。为了便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除了减少會議、表报和其他机关事务之外，辽阳县在公社一級干部中还普遍推行定期蹲点（即在一个队劳动和工作）、到其他队巡迴检查和回公社总结学习的制度。今年干部参加劳动，都是事先与生产队商量好，請他們分配活計，实行“事先排号，按时报到，跟班劳动，服从领导”的制度，真正做到了与社員同出、同归、同劳动、同記工、同商量，克服了过去某些干部参加劳动“打游击”的現象。

此外，今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普遍注意了农活的质量。他們多問、多学，对不熟练的农活宁可少干些，也一定要干好。老农看到干部作活不含糊，因而很滿意。社員欢迎干部去劳动，有的写大字报，表揚参加劳动好的干部。

通过参加劳动领导生产，使干部的思想作风和领导方法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許多干部对生产情况更熟悉了，生产知識更丰富了，有些不懂农活的干部也学会了一两手农活。有的还拜老农为师，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有的种了試驗田。由于許多干部在春耕播种、抗旱保墒和防治病虫害等工作中，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因此对今年春耕生产的领导就更加具体、更加踏实了。

同时，由于干部和群众在一起劳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把干部真



正当作自己的知心人，无话不说。从国内外大事，生产和生活，直到妇女养育子女、青年婚姻的问题等，都提出来和干部讨论。干部便针对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同社员群众谈时事，讲政策，论生产，彼此之间真是息息相关，亲密无间。群众有事找干部，干部有事找群众；老农成了干部的参谋，干部成了社员的“主心骨”，共同商量生产大计。社员赞扬干部是“好管家的”，“好打头的”，“好掌舵的”。许多基层干部反映：过去不参加劳动，就像有点“耳聩眼花”，现在一参加劳动，什么都听见了，什么都看见了，“情况明，问题看得清”。现在干部碰到一起，首先问劳动了多少天，在劳动中发现和解决了什么问题，交了多少朋友，互相畅谈劳动中的收获和感受。“劳动光荣”、“劳动是根本”，已经成为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经常讨论的重要内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鼓舞了群众劳动的积极性，群众称颂说：“干部下田间，一天顶两天，问题解决快，社员干得欢。”

今年鞍山地区农村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以能够比去年更进一步，主要是继续紧紧抓住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深入解决思想问题，不断地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是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的过程，是新旧思想斗争的过程，是思想作风、工作方法的一次革命，必须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继续狠抓几年，才能使这项制度巩固下来。今后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求进一步提高自觉性，并使之经常化。因此，仍然必须继续

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思想障碍，一个是怕劳动多了影响工作。有些干部习惯坐机关、蹲办公室，或者用东跑跑、西转转的方法来领导生产，认为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面领导就会受影响；有的还强调社、队干部事务多，群众找的多，如果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许多事情就会没有人来办理。另一个是有些干部长期脱离生产，沾染了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思想。甚至有少数干部认为，干部操心多，睡觉少，还要参加劳动，是吃亏了。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劳动习惯的知识分子干部来说，让他们放下架子，同群众一起劳动，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开始劳动，不少人反映腰酸、腿疼，有的就不想坚持劳动，有的甚至认为“十年寒窗白费了”。此外，有的认为“干部工作多，参加劳动的时间少，干部的工分补贴标准低了”。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搞不起来，搞起来也很难坚持下去。

因此，今年各地在发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候，进一步反复地组织干部学习了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并且总结本地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由劳动好、工作好的干部座谈体会，请他们作报告，或者组织干部前去参观访问，学习先进经验，以提高干部对参加生产劳动的偉大革命意义的认识。有的还用事实对比的方法来教育干部。如鞍山市郊区宁远屯人民公社新堡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张殿玉，从土地改革后就当干部，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



民的本色，群众非常拥护他。和这个大队相邻的一个大队，有一个干部虽然是雇农出身，但是由于平时不注意和社员一起劳动，逐渐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比较差的二台子生产大队的党员和干部，开会分析和对比了这两个典型人物所走过的不同道路和不同结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可以减少补贴工分，增加生产队和社员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鼓舞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干部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可以更深切地了解群众、了解实际，更好地领导生产，办好集体经济；可以使干部在与群众共同劳动中不断地得到锻炼和提高，成为与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又红又专的好干部。从此以后，这个大队从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到生产队长、会计，都无例外地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

在对干部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工作中，各级党委还强调因队、因人制宜地具体帮助，争取做到登门访问，进行个别教育，从各方面关怀干部，把思想工作做到家。许多公社党委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亲自到干部家里谈心，帮助安排工作，解决具体困难问题。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很好地解决了不同干部的不同具体思想问题，使干部深受感动。至于有的人提出关于干部补贴工分的规定标准低的问题，则要他们先不去算账，先把干部发动起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事实上，只要把干部发动起来认真参加集体生产

劳动，并加强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是可以做到补贴工分不超过规定标准的，而且有许多社、队还可以低于规定的标准。

二、具体帮助干部制定工生产计划，定期检查评比。今年各地在解决干部思想问题的基础上，普遍地发动干部讨论和制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计划，落实了定工生产任务。公社以上干部根据每个人的工作繁简和体质强弱，采取自报、公议和领导批准的办法，定出每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天数。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的补贴办法，主要采取三种形式：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队长和会计，实行定工生产、定额补贴；生产队会计，实行固定补贴；大队的其他干部和生产队长，实行因公误工补工。在普遍制定干部定工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实行定期的检查、评比和奖励，以推动干部参加劳动的积极性。辽阳县级机关在四月底，曾对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进行了初步检查，依各单位与个人劳动好坏的次序列榜公布，立即掀起了干部下农村参加劳动的热潮。许多社、队干部，则“进屋先看榜，下队先劳动”，明比暗赛，谁都不愿意落后。经验证明，一年通过几次检查评比，促进干部参加劳动的积极性，是个好办法。特别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刚开始执行的地方，更需要检查评比，并且评比要认真地做。没有这种认真的检查评比工作，就不能定期总结经验，树立榜样，就容易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松懈下去。

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层层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推动干部参加劳动最实



际、最有效的方法。辽阳县今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所以劲头比较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县委决心大，领导干部带头。县委书记、副书记等领导干部，都分别在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参加劳动。社、队干部说：“县委书记都参加劳动，咱们还有啥说的。”鞍山市郊区各公社的干部去年参加劳动差，今年区委决定从区、社领导干部作起，一齐下队参加劳动，很快就打开了局面，把区、社、大队三级干部都带动起来了。

四、总结典型经验，加以宣传推广。去年总结推广了王石人民公社和柳条寨人民公社的经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年除了继续总结推广这两个公社的经验外，还准备帮助牛庄人民公社总结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经验。同时，还要不断地表扬劳动好、工作好的干部。如海城县温香人民公社大连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玉峰，今年已五十六岁，长期坚持干硬活，并采取田头会议的办法，做好了各项工作。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去年全大队干部都超额完成了定工生产任务，而且工作也做得很好。今年到四月底，他已经劳动了七十三天。三月份公社党委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会议时，着重介绍了陈玉峰的事迹和经验，收效很大。又如，该县西四人民公社，有许多人强调会计工作特殊，怕会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把账目搞乱了，公社干部也没有信心。后来发现该社太平庄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会计包春相，不但去年劳动好，工作也好，而且今年已经劳动了一百多天，管理的账目却清清楚楚。公社抓住这个典型

事例以后，到处宣传讲解，因而促进许多会计人员也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这样，会计人员的工作和劳动也结合得更好了，有的白天劳动，早晚记账，有的规定会计办公日。经验证明，分别总结不同的典型经验，树立样子，加以宣传推广，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各级农村干部的具体工作任务、工作方法以及工作条件不完全相同，他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可能、方法和问题也不完全一样。分别总结干部参加劳动领导生产的具体经验，分别树立样子，就更有教育意义。

此外，各地今年继续精简会议和报表，建立和健全机关工作制度等，也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创造了方便条件。

今年鞍山地区农村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虽然更加普遍，但是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指示的精神，以及对照山西省昔阳县的经验来检查，还做得不够。全地区还有一些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大好，甚至有少数生产大队的干部定工生产任务和补贴工分计划还未落实。同时，在已经落实劳动计划和补贴工分的生产队中，有的补贴工分还较多。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此外，市、县两级的会议、报表还很多，向先进的单位要材料的、找谈话的也多。因此，市、县领导机关必须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市、县分管农业的干部也要切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这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切实地做好，长期地坚持下去。



地委书记余锡渠同志

伊 晓

中共汕头地委书记、汕头专署副专员余锡渠同志，一贯保持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最近，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党的组织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和干部，向余锡渠同志学习。下面记述的，是余锡渠同志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经常深入农村，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一些事迹。

余锡渠同志在解放以来的十多年中，一直担任领导职务。最初是澄海县的县长、县委书记，以后任粤东行署农业处副处长，汕头专署副专员，一九六一年底任地委书记。余锡渠同志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十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个普通劳动者的俭朴本色。澄海县刚解放，余锡渠同志奉命去接收县政府时，穿的是一身粗布衣服，打着赤脚。有的老乡就同他开玩笑说：“哪有赤脚板的县太爷呀！”余锡渠同志回答说：“我们又不是国民党当官的，要耍威风！共产党员打游击也好，当县长也好，还不都是为了领导群众闹革命！”从那时以来，余锡渠同志生活作风的俭朴，一如往日。身上穿的仍然是粗布衣衫，有的补了又补；脚上穿的是“水陆两用”鞋。他住的房子不大，陈设更是简单，除—张床，—张桌子，—把椅子，—个书橱，—只皮箱，

再无别的东西。他睡的是木板床，床上只有—张草席，—条薄被，—个用水布（土布做的浴巾）和衣服包成的枕头，—顶从土改时用到现在的单人蚊帐。他经常是工作在哪里，就吃在

哪里，就住在哪里，就在哪里赤脚下田。

余锡渠同志一直能够保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直作为—个普通劳动者生活在群众当中，很好地发挥了—个领导者在党的集体领导下应有的作用，是基于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责任感。早在澄海县担任县长期间，余锡渠同志为了领导群众改变澄海县灾害频繁的自然面貌，曾不辞辛劳地做了许多艰苦踏实的工作。

澄海是个滨海县份，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只有六分耕地。这个县的地势很复杂。韩江进入澄海后，以扇形铺开，分作十七条支流入海，个别河床高过田地，部分内地又低于沿海。过去洪水、旱灾、台风和内涝，轮番为害，生产很不稳定。在旧社会里，—遇灾荒，许多农民就无法生活，有的只好流亡国外谋生。余锡渠同志是本地人，深知群众的这些苦楚。澄海—解放，他就领导群众兴修水利，为战胜自然灾害而斗争。

余锡渠同志是个农民出身的干部，不懂水利工程。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牢记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面精心阅读水利方面的书籍，—面进行实地调查。每逢下雨，他就雨衣—披，骑着自行车，从县



城到海滨，从境内韩江上游到各支流的下游，观察地势哪里高，哪里低，哪里积水，哪里可以泄水，哪里怕旱，哪里可以引水灌溉。他还拜访了经历过种种灾害的老人，搜集水文资料，请教防洪御旱的经验。就这样经年累月，他把澄海县的水文地理的古怪性格摸熟了，治水的办法也就慢慢积累了起来。经过县委的集体研究，澄海县的第一个治水蓝图诞生了。接着这个蓝图，几年时间，澄海县兴建了许多排洪、灌溉、拒咸、防潮等工程。在兴修水利工程的时候，他又亲自到工地指挥，并和民工们一起劳动。这个原来灾害最多的县，终于成为全专区水利最好的县。

在专署，余锡渠同志分工负责农业技术改革和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无论部署工作，决定和解决问题，他总要事先去基层作调查研究。在担任地委书记和副专员后，他仍然做到一年以大部分时间，下到生产队，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有人曾经这样说：“要说余锡渠同志的办公室小嘛，可也大，那就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的汕头专区的整个农村。”一九五九年冬，余锡渠同志带着工作组，在澄海县上华公社冠山大队搞平整土地，他和基层干部、社员一起，参加劳动。

由于余锡渠同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生活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之中，和他们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因而他到哪里，干部和社员都把他当作家里人一样，乐意向他讲知心话。他也能很好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出主意，想办法，真正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一九六〇年夏种时节，他到澄海县盐鸿公社鸿沟大队检查生产。社员和他一见如

故，就“老李”（余锡渠同志作地下工作时的化名）长“老李”短地向他详谈了那里生产搞不好的原因。他随即和干部、社员一起认真商量解决的办法，提出了改进经营管理的具体措施。从此以后，这个大队的经营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正规，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越来越高，全大队在立秋后六天，就胜利完成了插秧任务。这年晚造，鸿沟大队终于获得了丰收，“落后大队”的帽子就被摘掉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一级的强台风，在潮汕地区登陆，澄海县首当其冲，鸿沟大队成了重灾区。哪里最困难，余锡渠同志就到哪里去。当时，余锡渠同志刚从医院休养归来，身体还未完全恢复健康。当夜，他就从汕头冒着风雨，赶赴澄海县委，并在天亮前赶到了鸿沟大队。这个大队决堤七十处，庄稼全被海水浸渍。灾情是严重的。余锡渠同志当即和干部撑船去察看堤坝，又对海水已退的田禾逐块看过，了解被盐渍的程度。他根据群众对开展生产自救的迫切要求，提出一方面抓紧堵口、复堤，引淡水冲洗，抢救稻田；一方面“要用抗灾的劲头，绣花功夫”，在海水浸渍过的田地上改种番薯。余锡渠同志亲自向社员作动员解释，并作试验示范，打消了群众对改种番薯的顾虑。加上认真地贯彻了党对重灾区的政策，建立了明确的生产责任制，因此，改种番薯很快形成了群众自觉的行动。由于种的时候，经过引淡水咸，种了以后，又不断浇水，番薯长得非常好，全大队不仅安稳地度过了春荒，还有大批番薯出售。鸿沟大队也因此成了汕头专区生产自救的一面旗帜。

余锡渠同志常说：“指挥员不能光凭一张嘴，应该哪里最危险，最需要，就到哪里去。”



他就是这样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

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到澄海县外砂领导封锁韩江的工程。快要合壩的时候，已是下半夜，合壩口的一艘木船翻了。船上有十二个人。余锡渠同志看到这个情景，说了一声“下水救人”，连衣服也没脱，就带头纵身跳入江中，救起了落水的民工。一九五六年夏天，韩江洪水暴涨，潮安县庵埠的涵闸出现险情，眼看韩江东面澄海县的大片田地就要受淹。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跳进韩江激流中，摸索到了出现险情的原因，对症下药地采取了抢险措施，使涵闸转危为安。一九六〇年六月，强台风袭击汕头地区，余锡渠同志在韩江上协助指挥抢险防洪，在七天七夜中，每天只休息三、四小时。险象才过去，他从堤防上刚回到机关，揭阳县龙颈水库告急的电话来了。余锡渠同志在接到电话后两个小时，就赶到了现场。他站到开始塌陷的地方视察险情，研究对策，指挥抢险，干部和社员们都为他提心吊胆。他的镇定和勇敢，鼓舞了广大干部和社员固壩抢险的决心。在连续的紧张战斗中，他的胃病发作了，可是始终坚持，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指挥岗位。

余锡渠同志不仅自己克己奉公，同时还教育自己的妻子儿女不要有任何特殊感，要热爱农业劳动。解放以来的十多年中，虽然他工作的机关在城市，可是他一直让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农村，参加劳动。余锡渠同志在长期的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中，积劳成疾，患了肾脏炎、胃溃疡等慢性病。有的同志建议他把家属接到城市来住，这样可以在生活上对他有所照顾。可是余锡渠同志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儿女留在农村劳动，能为国家生产财富，而在城市闲住，就变成

一个消费者，增加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他家人口多劳动力少，他就让小学还没毕业的大儿子，回家参加农业生产了。他每次回家，总要帮助家里计划一下开支，绝不肯让生产队给他家庭有任何照顾。他经常谆谆嘱咐妻子儿女说：“你们是干部家属，社员和队干部很容易另眼看待，所以要更加谨慎。队里有困难，我们要走在前头，分东西却要退在后头。”他自己处处为他们树立这样的榜样。在一九五七年初，村里办高级社缺乏资金，他便把三百多元积蓄交给妻子投到社里。去年十二月，他因病回到家里，生产队关心地网了两条鱼送来，他坚决谢绝了。去年年初，村里通了电，为一百多户社员装了电灯，他家也装上了两盏。他回家后，即向队干部说：“我们村里有一千五百多户，等都有电灯了，再为我们家安吧。我们干部的生活不能超过一般群众啊！”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一家不仅以勤俭持家闻名，而且个个热爱劳动，热爱集体。他的妻子被评为“五好”社员，大儿子每月都出全勤，从不拈轻怕重，女儿从学校回来，也参加辅助劳动，干活总是踏踏实实，常受妇女队长的表扬。去年冬天，余锡渠同志鼓励自己的儿子带头参了军。十五岁的大女儿，就离开了学校，拿起他哥哥的锄头，参加农业劳动了。

余锡渠同志这种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忘我的精神，在汕头地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留下了良好的影响。正如潮安县凤南公社山垵大队一个老赤卫队员陈书垣同志所说的：“十几年前离开这个山沟进城去的是这个‘老李’，十几年后回到这个山沟里来的，还是这个‘老李’，他对革命的耿耿忠心，一点也没有变啊！”

